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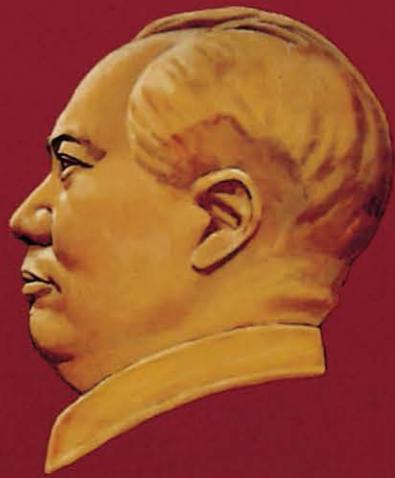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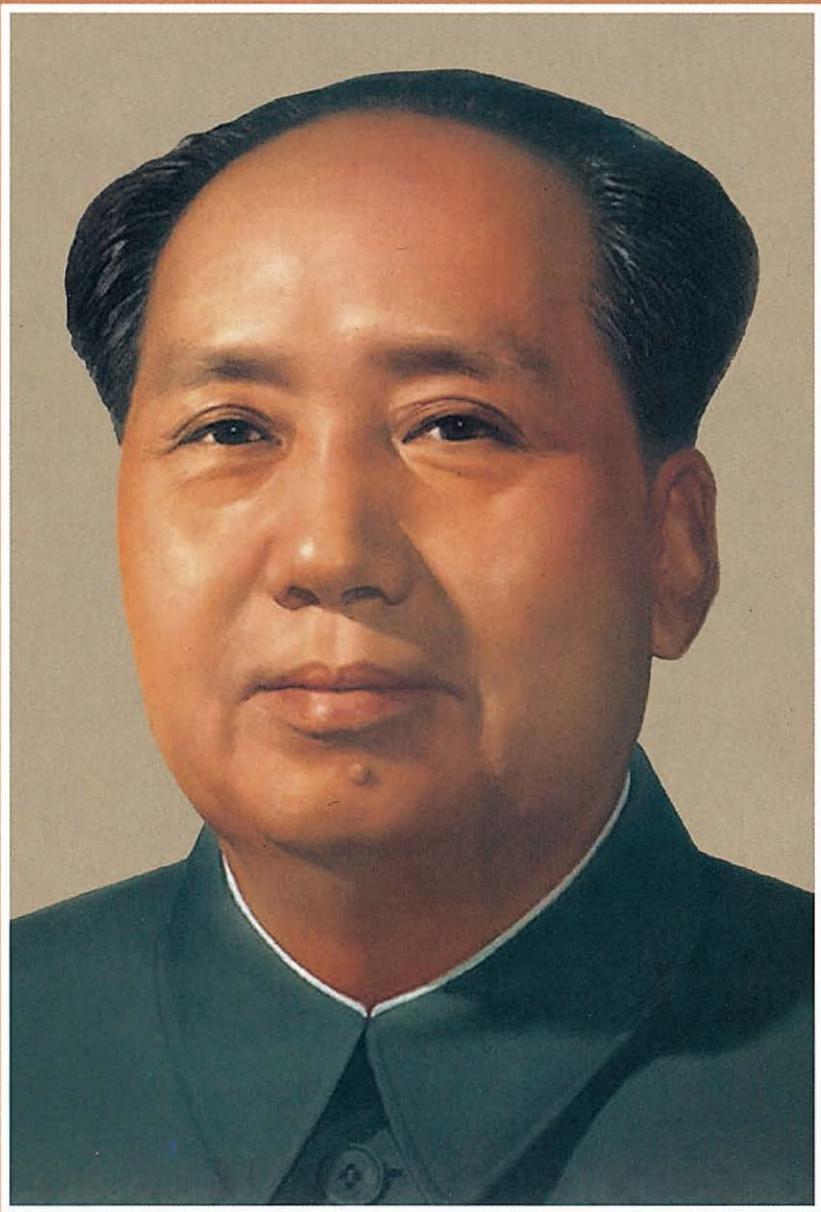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1
(1967年7月25日)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	2
(1967年7月)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	4
(1967年7月)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的指示···	5
(1967年7月)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6
(1967年7月)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7
(1967年7月)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8
(1967年7月)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加写的一段话 ···	10
(1967年7月)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	11
(1967年7月)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 ···	12
(1967年7月至9月)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16
(1967年8月4日)	
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	17
(1967年8月4日)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18
(1967年8月4日、7日)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的批语	20
(1967年8月11日)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21
(1967年8月11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	22
(1967年8月16日)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	23
(1967年8月18日)	
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4
(1967年8月、9月)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批语	28
(1967年8月25日)	
八·二七指示	29
(1967年8月27日)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30
(1967年8月)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	31
(1967年8月)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	32
(1967年8月)	

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	33
(1967年8月)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34
(1967年8月)	
关于武斗的指示	35
(1967年8月)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36
(1967年8月)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	37
(1967年8月)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38
(1967年8月)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39
(1967年8月)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40
(1967年夏)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41
(1967年9月1日)	
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	43
(1967年9月5日)	
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44
(1967年9月7日)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	45
(1967年9月13日、10月11日)	
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48
(1967年9月16日)	

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52
(1967年9月18日)	
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57
(1967年9月22日)	
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59
(1967年9月23日)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	60
(1967年9月23日)	
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61
(1967年9月27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	69
(1967年9月28日、30日)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71
(1967年9月29日)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72
(1967年9月)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73
(1967年9月)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74
(1967年9月)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86
(1967年10月3日)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	89
(1967年10月9日)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90
(1967年)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	91
(1967年10月24日、27日)	
对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报告的批语	94
(1967年10月25日)	
为李志芬题词	95
(1967年10月29日)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	96
(1967年10月)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98
(1967年10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	99
(1967年10月、11月)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102
(1967年)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103
(1967年11月5日)	
转发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谈话的批语	110
(1967年11月7日)	
对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简报的批语	111
(1967年11月15日)	
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经验的批语	113
(1967年11月16日)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	115
(1967年11月19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批语	117
(1967年11月20日)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118
(1967年11月22日)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	120
(1967年至1970年)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26
(1967年11月28日)	
对《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的批语	129
(1967年11月)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31
(1967年11月)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32
(1967年)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	133
(1967年12月17日)	
在《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的批语	135
(1967年12月17日)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136
(1967年12月19日)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的批语	138
(1967年12月29日)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	143
(1968年1月6日)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	144
(1968年1月16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146
(1968年1月30日)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147
(1968年)	
越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	148
(1968年2月7日)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50
(1968年2月10日)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	152
(1968年2月)	
对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	153
(1968年2月)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	154
(1968年2月)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	155
(1968年2月)	
对反映欧阳毅情况来信的批语	156
(1968年3月2日)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的批语	157
(1968年3月23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	159
(1968年3月25日、28日)	

对康生关于审阅祝贺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电报问题的检讨的批语	161
(1968年3月28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163
(1968年3月30日)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165
(1968年)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166
(1968年4月6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	169
(1968年)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171
(1968年4月16日)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的批语	174
(1968年4月29日)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等的批语	175
(1968年4月)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176
(1968年4月、5月)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177
(1968年5月8日)	
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	178
(1968年5月11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送审稿的批语	179
(1968年5月16日)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语	180
(1968年5月19日)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	181
(1968年5月20日)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的批语	182
(1968年5月21日)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	183
(1968年5月)	
在一份《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的批语	184
(1968年6月8日)	
对“七·三”布告的批语	185
(1968年7月)	
对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的批语	186
(1968年7月8日)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	187
(1968年7月12日)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批语	188
(1968年7月18日)	
对“七·二四”布告的批语	189
(1968年7月)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190
(1968年7月)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2
(1968年7月24日)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194
(1968年7月28日)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228
(1968年7月)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229
(1968年8月5日)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 的安排意见的批语	230
(1968年8月5日)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232
(1968年8月13日)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236
(1968年)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237
(1968年8月16日)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 批语和修改	239
(1968年8月20日)	
对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批语	240
(1968年8月25日)	
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242
(1968年8月25日)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 旗》杂志编者按	244
(1968年8月31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批语和修改	247
(1968年8月)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49
(1968年8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语	257
(1968年8月)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258
(1968年8月)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	259
(1968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261
(1968年9月1日)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263
(1968年9月3日)	
建议普遍开拥军谈心会	265
(1968年9月4日)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66
(1968年9月4日)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批语	268
(1968年9月6日)	
对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	269
(1968年9月)	

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一文的修改和批语	271
(1968年9月10日)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273
(1968年9月17日)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275
(1968年9月17日)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	278
(1968年9月20日)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279
(1968年9月23日)	
给周世钊的信	280
(1968年9月29日)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报告的批语	281
(1968年9月29日)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282
(1968年9月、10月)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	284
(1968年9月)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286
(1968年9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批语	287
(1968年9月)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292
(1968年10月13日、31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	300
(1968年10月14日)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301
(1968年)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302
(1968年10月15日)	
对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的批语	304
(1968年10月)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	305
(1968年10月)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	307
(1968年、1969年)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311
(1968年)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312
(1968年10月30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320
(1968年11月4日)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321
(1968年11月10日)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	323
(1968年11月14日)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要信摘要》上的批语	324
(1968年11月15日)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326
(1968年11月17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330
(1968年11月28日)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333
(1968年11月28日)	
同意转发北京军区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338
(1968年11月)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	339
(1968年)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340
(1968年12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342
(1968年12月19日)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	344
(1968年12月)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调查报告的批语	345
(1968年12月)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	346
(1968年12月)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的批语	347
(1968年12月)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348
(1968年)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349
(1968年12月)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	351
(1968年至1969年)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	355
(1969年1月3日)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报告的批语.....	357
(1969年1月28日)	
打仗就是要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	358
(1969年1月28日)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	360
(1969年1月)	
如梦令·韶山冲*.....	361
(1969年1月)	
在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362
(1969年1月)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做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	363
(1969年2月)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365
(1969年)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366
(1969年)	
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367
(1969年3月15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关于总结经验》的批语	371
(1969年3月)	
要认真总结经验	372
(1969年)	
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375
(1969年3月、4月)	
在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382
(1969年3月31日)	
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	383
(1969年3月)	
在周恩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384
(1969年3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	385
(1969年4月1日)	
和谢富治等的谈话	397
(1969年4月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	401
(1969年4月1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	406
(1969年4月13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四)	416
(1969年4月14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425
(1969年)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426
(1969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五）	427
(1969年4月23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432
(1969年4月28日)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发言稿的批语	442
(1969年4月)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问题	443
(1969年4月)	
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444
(1969年5月、1970年2月)	
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	446
(1969年4月)	
对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批语	448
(1969年5月)	
清平乐·警觉苏修*	449
(1969年5月)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	450
(1969年6月6日)	
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	451
(1969年6月26日)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	452
(1969年6月)	
对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的批语	456
(1969年7月3日)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语	457
(1969年7月21日)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的批语	458
(1969年7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的批语	460
(1969年7月)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军组织纪律性指示稿的批语	461
(1969年8月)	
对中共中央命令稿的批语	462
(1969年8月)	
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464
(1969年8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465
(1969年9月1日)	
对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	469
(1969年9月)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476
(1969年10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477
(1969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480
(1969年12月19日)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稿的批语	482
(1969年12月25日)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学校名誉校长的批语	485
(1970年1月)	

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486
(1970年1月)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	487
(1970年1月)	
念奴娇·长征*.....	488
(1970年1月)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	489
(1970年2月4日)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稿的批语.....	490
(1970年2月)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通知稿的批语.....	491
(1970年2月)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的批语.....	493
(1970年3月13日)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494
(1970年3月14日)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	495
(1970年3月)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	496
(1970年3月)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	498
(1970年3月)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通知稿的批语	499
(1970年3月)	
献给斯特朗的花圈上的挽词.....	501
(1970年4月2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 稿的批语和修改.....	502
(1970年4月3日)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	506
(1970年4月12日)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请示报告的批语.....	507
(1970年4月24日)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7月25日)

—

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2]。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下午十时

—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1] 本篇一写在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1967年7月24日转送的这封信稿上；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这封信。

[2] 即本篇二。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

(1967年7月)

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话就行了。一句话：错了；二句话：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是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句话：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

军队这几年群众工作做得少，错了改了就好，也不给处分，也不要治罪。



张爱萍陪同毛泽东接见部队指战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

(1967年7月)

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过去革命条件下，提出这个口号是对的。但现年的情况变了，城市住的无产阶级，你用农村包围城市干什么？包围城市就是包围无产阶级，包围革命造反派。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的指示

(1967年7月)

这个人是否还可以用？你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你们水平怎么这么低，也不研究一下？据我了解，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对打仗很勇敢的人还是很尊重的。他犯了错误当然可以批判，但既然他表示愿意改，就应给他机会，不要太过分。你们这样做，不能争取别人同情。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1967年7月)

上海的形势是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何搞好教学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搞些调查研究，创造一些典型材料。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搞不下去的。

过了夏天屁股要坐下来。

中学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规。军训还要搞，中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复课闹革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这是关系到革命的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是关系到把青年人培养成接班人，变不变色的问题。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1967年7月)

本来军内的问题没有机会解决，武汉问题发生了，就有机会解决了，机会是他们给的。

全国都应该从武汉事件中学习。全国支持武汉地区，武汉地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作。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这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

武汉一小撮人的叛变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

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1967年7月)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颠倒的。



1967年，毛泽东在南京长江摆渡口。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各大军区领导时和王恩茂在一起。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加写的一段话

(1967年7月)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1967年7月)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

(1967年7月至9月)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

[1]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10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这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

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

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多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 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8月4日)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2]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3]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泽东

八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1967年7月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2] 徐悲鸿，著名画家，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3] 齐白石，著名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尤精国画。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 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1]

(1967年8月4日)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1967年7月25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一、二月间《毛泽东选集》各翻译组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问题，纷纷提出，要求修改或删去《选集》正文、题解、注释中出现的一些人名。”经请示主席后，“决定仍照原文翻译（当时中央同意删除刘少奇的两段话和《历史问题决议案》）”。最近，我们曾请示删去“王明同志”的“同志”两字，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同意。同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同志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你们转报中央批示。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 批语和修改^[1]

(1967年8月4日、7日)

—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1]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二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的批语^[1]

(1967年8月11日)

—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泽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1] 本篇一、二均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8月11日送审的这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上。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8月15日《人民日报》和8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1967年8月11日)

材料不黑，性情直爽。

陈毅是个好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四十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 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1]

(1967年8月16日)

—

已阅，照办。

毛泽东

—

信的开头，“广大的职工群众们”一句是主席加的。

信的第七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一句后加了“工人阶级利益”几字。

信的第八段“凡是坚持下去、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整段都是主席新加进去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1]

(1967年8月18日)

照办。

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8月17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中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暂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直接领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党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8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

对《评陶铸^[1]的两本书》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67年8月、9月)

—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

[1] 陶铸，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年初，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攻击和诬陷而被打倒。他的两部著作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也因此而受到错误的批判。1969年年底，陶铸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2]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炮制的。本篇一写在姚文元1967年8月17日送审稿上；本篇二写在姚文元8月26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姚文元9月3日送审稿上；本篇四、五是在姚文元9月3日送审稿中写的两个批语；本篇六是在姚文元8月26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发表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加或显得太长。究竟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

二

姚文元同志：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1]，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2]，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毛泽东

八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判^[3]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又及

[1] 即本篇六。

[2]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

[3] 刘，指刘少奇。

三

文元同志：

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四

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1]

[1] 姚文元1967年9月3日送审稿中原有以下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9月3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转报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第八页），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五

不要用黑体字，应与上下文一律。^[1]

六

这个反动组织^[2]，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1] 姚文元1967年9月3日送审稿中，将毛泽东8月28日加写的一段话（即本篇六）用黑体字排印。对此，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这段话未用黑体字排印。

[2] 指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5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1]的批语

(1967年8月25日)

很好，照发。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五日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25日下发的这个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八·二七指示

(1967年8月27日)

- 一、许世友要帮助过关，他是一个战将，文化革命以来，落下了，跟不上；
- 二、要出马恩列斯语录；
- 三、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
- 四、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了一篇好文章（指《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
- 五、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
- 六、群众组织提以我为核心，这样提是极蠢的；
- 七、依靠青年人；
- 八、依靠群众，加强专政，新疆办大型劳改农场不一定好，要研究；
- 九、要抓学习，把工作做好，要精兵简政。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1967年8月)

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地联合。每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充分的注意，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否则就会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派互相攻击，刘少奇坐山观虎斗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

(1967年8月)

去年走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倒忙。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 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1]

(1967年8月)

还我长城。

[1] 这篇社论的题目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是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锋批准发表的。社论中错误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毛泽东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

天津、河北应该搞得更好一些，因为天津、河北离北京近，特别是天津，容易影响北京。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1967年8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武斗的指示

(1967年8月)

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对形势不能看得太严重，不要急。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乱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好的。打架是支流，是暂时的支流。决不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行动要愈快愈好，工作不要太急，要做到家。^[1]

[1] 这是对增派往温州的六二九九部队的指示。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 把走资派打倒

(1967年8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1967年8月)

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7年8月)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夏)

古今多少苍茫事，
前车历历未能忘，
鸿门宴上宽纵敌，
乌江边头何仓惶。
秀全空坐失良机，
天京终于烟灰场，
急世英雄行大劫，
莫顾尘界百创伤。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7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

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它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当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妄图挽救它的失败。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力图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指出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不怕艰苦、牺牲，坚决战斗到彻底胜利”。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必将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更加强大了，更有力量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中国人民决心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1]

(1967年9月5日)

总理：

已阅，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9月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稿上。命令稿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命令。

在戚本禹检讨信^[1]上的批语

(1967年9月7日)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9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1968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9月13日、10月11日)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8月9日在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的讲话中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调查研究，听取两方面意见。第三，现在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而要以是否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否拥护毛主席作为划分的根据。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挂帅，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退。对林彪的这个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先后作过两次批示（即本篇一、二）和修改。他加写的文字，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他删去的文字，除点名批判的几处人名外，还在林彪讲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林彪同志：

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1]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2]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恩来，即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1967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三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

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9月16日)

南萍（以下简称南）：主席！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南萍，你就是南萍吗？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2]有经验。

南：我是照主席指示办。

陈励耘（以下简称陈）：主席！

毛：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五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陈：是。

毛：空五军和二十军要互相学习；二十军向空五军学习，二十军为主嘛，空五军要服从。

毛：你服从不服从啊？

陈：服从。

毛：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

[1] 1967年9月16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2] 指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

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南：没有。

毛：这是一大缺点。

毛：你挨过整没有？

陈：三反时挨过整。

毛：好！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南：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毛：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后)

毛：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

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二十军和空五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泽东反映空五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太好时）

毛：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毛：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

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六十二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罚跪、抄家，他们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谈话过程中，说到了南霁云时）

毛：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

毛：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几句话）

毛：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9月18日)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时)

毛：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进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1] 1967年9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时，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当谈到内战问题，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它为中心时)

毛：那也不一定。

(当谈到抢枪时)

毛：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发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造反派了嘛。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毛：这也是一个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

毛：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毛：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当谈到“高司”问题时)

毛：“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毛：不是还有个姓万的吗？

(当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毛：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毛：解放军有“五不”了。

(当有人请示解放军游行可不可以拿枪时)

毛：开大会军队可以武装参加。

(当谈到军区问题时)

毛：过去军区派巡逻队摩托车出去，被拦住，没有威信嘛。现在□□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军是大军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毛：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当谈到火车不通时）

毛：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毛：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哪里？

华国锋：在长沙，被斗得很厉害。

毛：为什么要斗得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他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也影响到县人武部，省委、省人委，地专、市机关瘫痪了时）

毛：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带头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

张春桥（以下简称张）：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大精简。

（当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毛：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当谈到干部问题时）

毛：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毛：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

毛：军队的、党的机关都要训，不光是犯过错误的，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吸收红卫兵参加，要帮助他们学习。

（当谈到湖南的“红旗军”问题时）

毛：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当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毛：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要搞起来。

张：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驻军召开了全省会议，情况很好。

毛：开会也是训练。

（当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毛：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嘛！

张：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毛：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

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谈到拿枪时)

毛：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当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毛：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视察河南时的指示^[1]

(1967年9月2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斗争。

毛：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大有好处。

毛：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

毛：（问王新同志）是什么时候到河南来的？

毛：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了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

毛：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汇报到各地都站出了一些革命干部时）

毛：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要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

毛：集训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的情况，化肥厂主张打，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时）

[1] 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见了刘建勋、王新、纪登奎，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这是刘建勋1967年9月26日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

毛：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的意思。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打死人时）

毛：群众都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香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从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思想批倒。

毛：对！

视察武汉时的指示^[1]

(1967年9月23日)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地实现三结合。

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做大联合的模范，希望做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

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自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1] 这是毛泽东视察武汉期间，听取关于武汉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后，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的指示。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 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 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1967年9月23日)

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9月22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9月28日起一律撤销。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通知。

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9月27日)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答：军分区人武部保守派发的。

毛：噢。

(当汇报到抚州问题时)

毛：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毛：从这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是军事叛乱。

毛：你们确定了没有？

[1] 这是毛泽东等在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做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等同志。

答：定了。

毛：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毛：噢，性质是叛乱，是要袭击，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

毛：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王景义的问题时）

毛：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毛：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

答：还没有。

毛：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

答：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不成。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

毛：噢。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讲刘培善、林忠昭罪责难逃，没有吴瑞山。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32·111》已经基本瓦解时)

毛：听说有些散兵逃到了宁昌、广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散了。

毛：噢，已经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

毛：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造反派的群众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好，你杀人家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一个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毛：《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收复了。

毛：庐山有个姓娄的吗？

答：叫娄□□。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毛：这个人哪一派的？

答：是保守派的。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

毛：噢，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

(当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

毛：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当汇报到李胜的问题时)

毛：李胜，就不用汇报了。

毛：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毛：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公路、航运也通了。

毛：江西还有没有？大县还有，小县没有了。

毛：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呢？

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像好一些。

答：多数人比较好。

毛：还有钟福昌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毛：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毛：你们回来多久？

答：一个月了。

毛：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儿，一个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搞，看他们搞出个什么花样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搞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程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时)

毛：把程明远放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毛：黄知真、白栋村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

(在汇报了黄、白的情况后)

毛：如果能保，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以下简称张)：原来省委把黄知真摆在第一线。

毛：我看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毛：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毛：干部垮掉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南昌串连。

（当汇报到他们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毛：哪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垮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当汇报到《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

张：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毛：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哪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知道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同志在井冈山当兵，后来到了这里，到了陕北以后我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才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只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也只知道某某团长、某某师长、某某军长，也叫不上名字，我还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们饭吃好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

毛：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进驻抚州时，在路上遭到夏绍林他们的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的都是头部和胸部，牺牲五人，五十六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密码、电台搞走了，主席很惊讶地啊了一声。)

毛：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毛：(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有多少人啊？

陈：(略)

毛：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师李文忠支左爱民事迹时)

毛：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十七个人。

毛：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还问黄光、刘瑞森、郭光洲同志是哪里人，郭光洲回答是吉水县人)

毛：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文天祥是吉水人！

毛：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军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毛：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毛：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遏止不住，一斗就是戴高帽子、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叫军区、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去受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毛：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干部会议，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行，江西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毛：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毛：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期不行，可以训练二期、三期。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

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了？

答：红卫兵抓刘培善、吴瑞山、林忠昭，还有人到福建抓□□□，总理叫我们打电话回来。

毛：你们打电话也不一定灵吧？

毛：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来台，要使他们改正错误。你们现在有理，但做过分不好。

汪东兴：现在十一点半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毛：就这样吧！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1]

(1967年9月28日、30日)

—

可用。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

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而写的。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7年9月28日凌晨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9月30日凌晨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的批语。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0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

三

即退陈伯达同志照办。

修改得很好^[1]。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十二时

[1] 根据毛泽东1967年9月28日批示的意见（见本篇二），陈伯达9月30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列宁以下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同时，社论修改稿上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外，还有4处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 陈伯达1967年9月30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讲的两段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对其中的第二段话，毛泽东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修改后的这段话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67年9月29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下午九时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这个讲话稿，是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张春桥起草，经周恩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以及小组其他成员讨论修改而成的，后发表在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上。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1967年9月)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1967年9月)

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1967年9月)

今年的国庆要充分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游行不单是游行，也是大批判。用文艺武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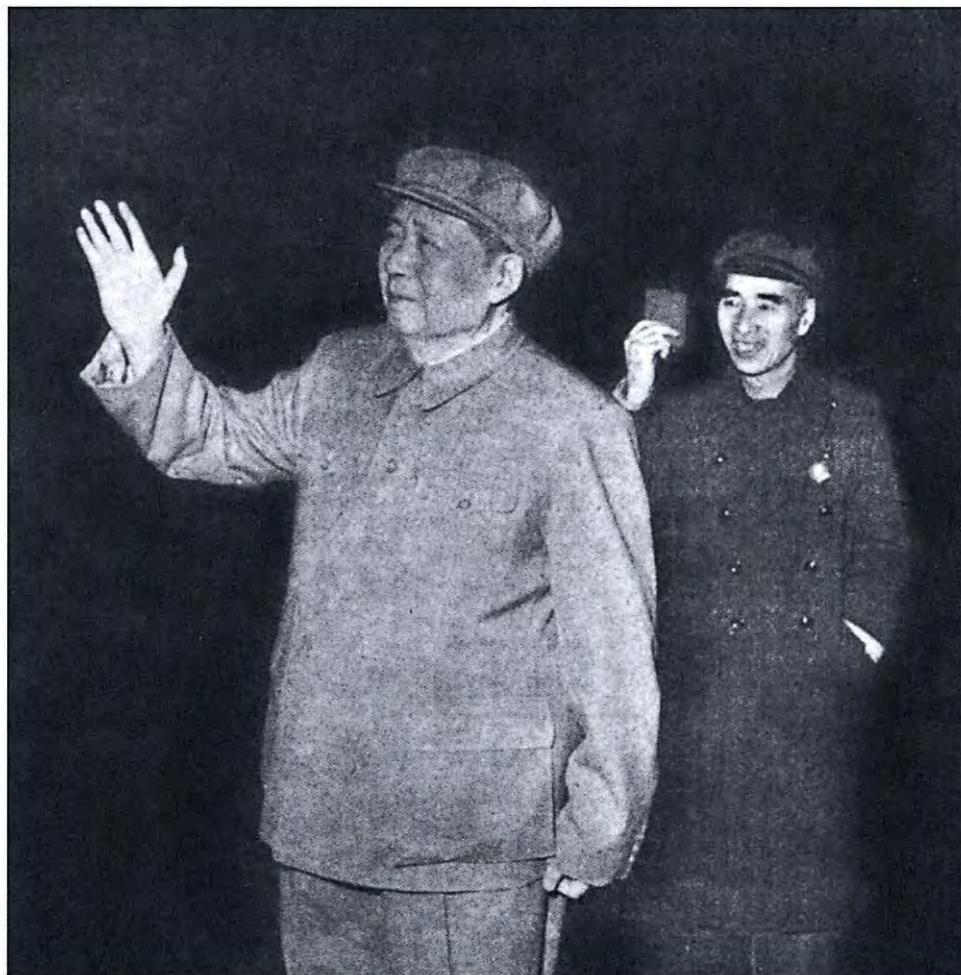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刚果（布）^[1]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1967年10月3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毛：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毛：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毛：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1] 1884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将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即今扎伊尔，以西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现在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1960年8月15日，刚果获得完全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1964年2月22日，中刚两国建交。

毛：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毛：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毛：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毛：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周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1]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1] 恩克鲁玛，加纳独立运动领袖，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加纳，他被选为总理。1960年7月1日加纳共和国宣布成立，他当选总统。1966年2月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恰逢国内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后来流亡并定居几内亚。



1967年10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 《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1]

(1967年10月9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3]

毛泽东
十月九日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0月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为了适应当前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需要，我们选编了批判资料——《刘少奇言论》。”报告中讲到，关于出版单位，“有几个方案，请择定：（一）中央文革办事组；（二）中央办公厅；（三）红旗杂志社；（四）人民出版社”。报告附送了关于此书的《出版说明》。毛泽东审阅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刘少奇言论》后来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名义出版，《出版说明》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967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通知还指出：“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196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 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1]

(1967年10月24日、27日)

—

中央文革各同志：

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

—

应当这样做。

—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

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

林彪、周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

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1967年10月19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中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

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是对陈伯达 10 月 27 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发出了这个电报。本篇四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 年 10 月 27 日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报告上。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这个报告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 26 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电话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于 10 月 26 日 3 时打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的。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聂荣臻^[1]关于国防科研体制 调整改组方案报告的批语

(1967年10月25日)

聂荣臻同志：

此件^[2]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 指聂荣臻1967年9月20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提出：一、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合理调整改组，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聂荣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为李志芬题词^[1]

(1967年10月29日)

好好学习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 李志芬，当时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写在她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上。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

(1967年10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1967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1967年10月)

不要调人。二十多个人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呢？人少了，多下去，会也开得短一些，在下面解决问题，少搞些小报。



热烈欢呼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胜利召开！

MARMY HAIL THE SUCCESFUL OPENING OF THE CHINES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AUTUMN 1967

热烈欢呼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胜利召开！（宣传画）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

(1967年10月、11月)

—

内件不看了。^[2]

二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3]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发表在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1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0月27日送审第三次稿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11月3日送审第六次稿的信封上。

[2] 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10月27日将编辑部文章第三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前送社论稿，字体太小。现送上大字本一份，请审阅。”对这次送审稿，毛泽东未作任何修改。

[3] 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11月3日将编辑部文章第六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篇社论，又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这里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指送审稿中概括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

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别‘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 worldview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原文是黑体字，即“作了新的整理”的毛泽东有关论述。在这次送审稿中，还大量引用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对这次送审稿中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字，此外未再作任何文字的修改。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 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7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¹¹

[1]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加编者按发表了《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

(1967年11月5日)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像个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啦、哇啦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

[1]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顺（1914—1999），河北遵化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20年。

[2] 陈老总，指陈毅。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解决当时存在的“是否取消军委”争论，毛泽东明确反对取消军委，会上，陈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当年10月份，3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1]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1] 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科研批判》1968年四、五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像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

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1]，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2]，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1] 十条，指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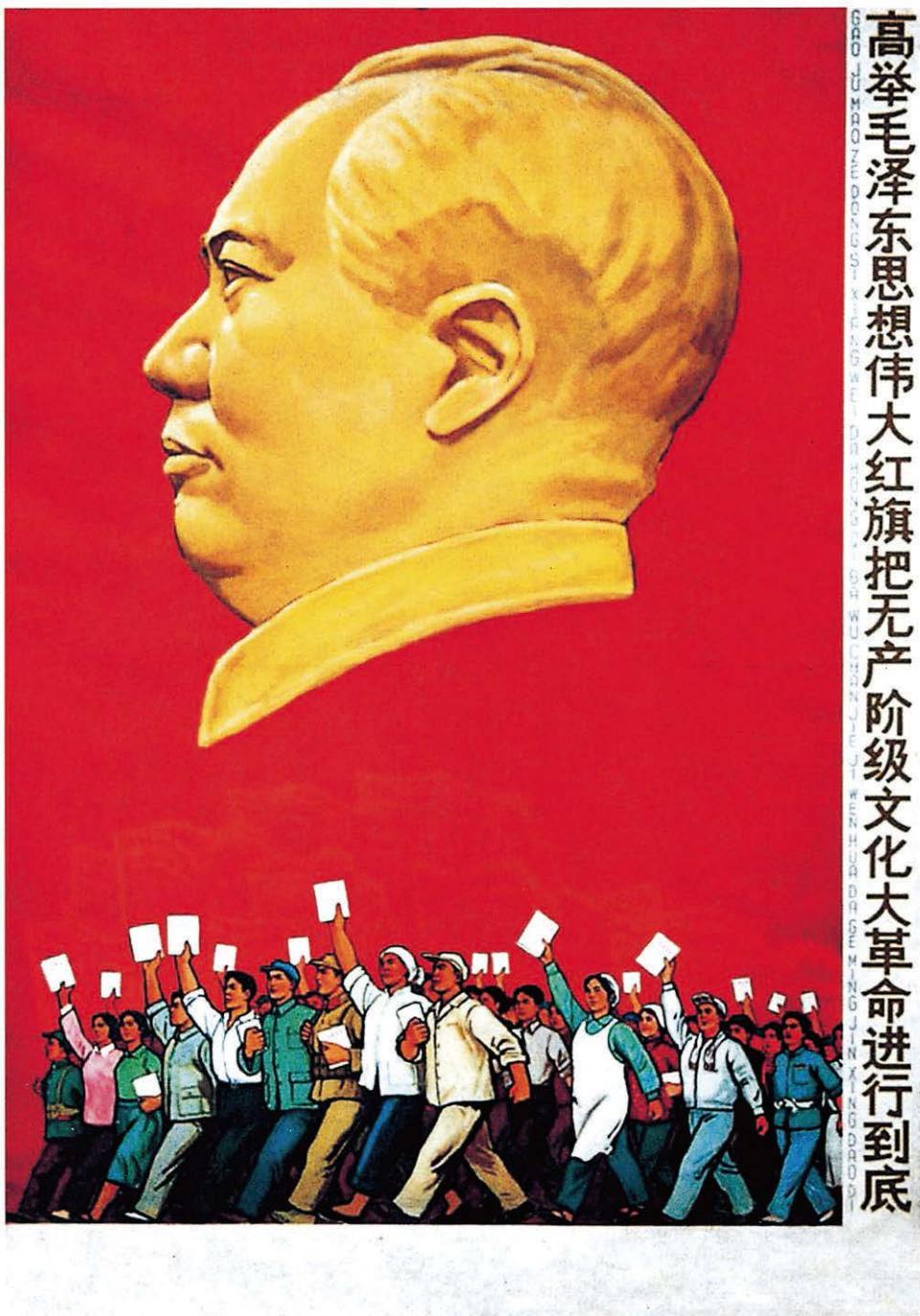
[2] 后十条，1963年9月20日，刘少奇主持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山西省委文艺组 晋文真红色海报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宣传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转发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 谈话的批语^[1]

(1967年11月7日)

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11月5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谈话，共5个部分。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发了陈永贵的谈话。

对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67年11月15日）

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10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356个，参加学习的有1.3万多人。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 注意工作方法的经验的批语^[1]

(1967年11月16日)

姚文元^[2]同志：

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11月30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上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批语。文章说，江西省革筹小组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工作方法。其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在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采取了用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在这一句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己革命化。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二

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

(1967年11月19日)

这个像章^[1]好，有海军又有空军，又有这么多群众，我就放心了。

[1] 指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敬献给毛泽东的像章。



1967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接见出席海军首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的批语

(1967年11月20日)

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上。

关于对浙大“红暴” 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1]

(1967年11月22日)

林彪、周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2]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11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中说，11月16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2] “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进行了平反。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合为原则。究竟如何，请讨论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

(1967年至1970年)

—

康生^[1]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3]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写的批语。

[3]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三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1]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四

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2]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五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

[1] 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其中“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1967年3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中国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同年11月，威尔科克斯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他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六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2]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七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3]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这个声明涉及缅甸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2]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1个字删掉，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他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画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八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

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此件缓发。^[2]

(一九六八年八月)

[1] 这是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中说，“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

十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1]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一

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2]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二

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3]

(一九六九年六月)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写的批语。

[2]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时，删去了其中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送审稿时，在“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4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写了这个批语。

十三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¹¹¹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写的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7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和颠覆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重大的措施，在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革命化运动，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个革命化运动，不仅对于保证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和坚持革命的外交路线，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博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高度赞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始终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坚决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1]叛徒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永远铭记阿尔巴尼亚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反修斗争中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年比一年更加亲密、更加深厚。我们愿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信念：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

[1]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情，不管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稿的批语

(1967年11月)

一

删掉了几句。^[2]

请林彪^[3]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4]。

二

不要这两句。

三

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5]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二时

[1] 这个通报汇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下达后第一批反映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九大”最根本的任务，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纲党章，总结路线斗争经验和开展路线斗争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和改革领导机构，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件和标准，“九大”的开会时间、规模、代表产生和开会方法等几个方面。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这个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遵照主席月初指示，康生、文元两同志收集和阅读了各地、各单位报来意见，起草了这一通报，并在20日晚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现送上修改后重印稿，请予审阅批示。”这个通报于11月27日下发。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报稿时，作了两处删改：一、在关于“九大”的最根本任务部分，删去了“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等语，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二、在这一部分，还删去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4个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主要是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部分，将“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句改为“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3]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5]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办公室1967年11月25日整理的电话记录稿上。记录稿说，“林彪同志电话交代：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中共中央通报稿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到的是毛泽东审改过的稿子，这一段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后面“和好学生”4个字已被毛泽东删去。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 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1月)

—

照办。

二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1月8日送审的中央指示稿上；本篇二是对指示稿中第一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196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967年)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¹¹¹

[1]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2日在“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用黑体字发表了这句话。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1]

(1967年12月17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

[1] 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7年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报告中说，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今年12月26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12月26日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特请示以下3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 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 我们不要题字。

(六)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在《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的批语^[1]

(1967年12月17日)

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1] 周恩来等1967年12月16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写道：“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3处“无限”和2处“非常”，并写了这个批语。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决定。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 七周年的电报

(1967年12月19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

[1]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批语

(1967年12月29日)

姚文元^[1]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2]，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上午四时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1967年12月28日，他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元旦社论，已经碰头会讨论通过（谈了两次），现送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这篇社论在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

[2] 在姚文元送审的社论稿上，毛泽东删去了“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句中“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后一个“万寿无疆”，删去了“用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句中“最高水平的”五个字。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宣传画）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宣传画）

1968



196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

(1968年1月6日)

退姚文元^[1]同志：

两件^[2]可用。

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3]。

毛泽东

一月六日下午三时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姚文元1968年1月6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两篇稿子均发表在1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3] 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并将“他们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句中的“步步”两字删去。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 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1]

(1968年1月16日)

此事早已弄清^[2]，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1] 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1932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封来信的摘要上。伍豪，周恩来的别名。

[2]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而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馆对于伍豪等的更正启事（照他们的章程纳广告费的），竟完全拒绝登载。这些报馆显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庇护，而积极实行这种危害革命反对工农兵士群众，并且间接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众革命的行为。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最高革命法庭根

据这个理由，宣布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以及一切登载所谓‘伍豪等’的启事而又拒绝登载更正启事的报馆总经理的死刑！”1967年5月17日，江青曾把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为此，他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写信报送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 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月30日)

康生^[2]同志：

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一月卅日

[1] 黑龙江省革委会1968年1月25日送审的这个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混入了军事机关。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1968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

[1] 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越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1]

(1968年2月7日)

过去有许多人总认为，越南打不赢美国。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越南人少、物质差，美国工业大、军队多。表面上一看似乎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对。美国的武器多，没处用。比如一个越南人同一个个美国人靠近了打，它的飞机去轰炸，难道只炸死越南人而美国人不受伤？所以一打近战它那些武器就没作用。比勇气，比战斗力，他们就更比不过你们了。一个国家去侵略人家，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就不喜欢它。越南人民不喜欢美国人，连伪军都不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控制人家。这样，他们就脱离人民，十分孤立。这个战争，你们胜利是肯定的，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时间也不长了。

一九五四年搞日内瓦协议时，划了个十七度线。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这五年中，他们杀了你们十几万人。你们又不得不拿起武器来搞武装斗争，从开头十几个人的游击队，经过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逐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从前以为大城市敌人防守严密，不好打进去，这次你们一打，看来也还是可以到里边去打的。现在很有利，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扩充些兵员，在农村扩大些地区，多歼灭点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城市可以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时谈话的一部分。

放到后头，如过去抗法战争时河内、海防都先不动，放到后头来解决。

南越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在军事上，建议你们组织几个野战兵团。每个野战兵团三四万人，每仗歼灭敌人四五千人。一仗打下来之后，又补充些兵员、弹药、粮食、药品等，然后再打。一个野战兵团一年打三四仗（三个月打一仗），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这些兵团要能远离家乡作战，可以在这个战术区打，也可以到另一个战术区打。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打孤立之敌，可以采取挖坑道接近敌人、进行近战和夜战的办法，使敌人飞机、大炮的火力失其作用。坑道可以在三四个方面挖。这些坑道不同于地道，有开掘式的，要能供部队运动和输送弹药。还要组织一定力量打敌之增援。所以一个野战兵团兵力要多一点，要有三四万。就是说，打接近奠边府那样的仗，目的在于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由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决定。相信越南劳动党中央会在新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办法。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 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1]

(1968年2月10日)

—

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十日

[1] 周恩来等1968年2月9日给毛泽东、林彪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批示，碰头会于今（9日）晚通过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示，现送上，请予审批。”中央批示稿中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各军下发了这个批示。

二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 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68年2月)

完全同意。

退总理办，并告林彪^[2]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为报送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反映了徐州等地铁路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 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1968年2月)

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8年2月14日送审的中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讲道：“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否则，即由上级派军管人员或由上级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派人来掌握生产和业务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条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注明可以在一切基层单位宣读，在内部张贴。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

(1968年2月)

广东形势大好，省革筹要抓紧关键，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带动广西、云南、福建、湖南等地区。因为此国防前线，有三条黑线。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

(1968年2月)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合中应该注意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1]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1]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对反映欧阳毅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68年3月2日)

林彪^[2]同志：

此件请你看一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

毛泽东

三月二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1968年2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炮兵机关斗争欧阳毅的情况。信中说，最近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武斗体罚严重，人已不像样子，恳求主席及中央首长能急速挽救他的生命，给他以活动自由。信中还说，欧阳毅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他绝不是坏人，恳请中央能详细调查他的问题。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8年3月2日，他批示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 大恐慌的日子》^[1]的批语

(1968年3月23日)

—

林彪、周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1] 香港《大公报》1968年3月18日刊载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经济危机的情况，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它们的出路的。文章最后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这是因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屹立在东亚大陆上，成为世界灯塔，任何侵略者妄想碰上一碰，势必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全世界的大好革命形势，尤其是美军已在越南一败涂地的事实，也使美帝国主义有所忌惮。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边吵边打，今后势将继续；但是，它们要是敢向全面战争的道路迈进，妄图借此解救危机，那么，它们彻底舒服的日子，必将更加提早来到！”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周恩来。

—
—

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 《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3月25日、28日)

—

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2月19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送审稿上写道：“送上社论一篇。其中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参见《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二。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3月28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这个送审稿上写道：“这篇文章改了一下，可否即于最近发表，可以说明大好形势，可以起正面引导作用。”本篇三是对陈伯达、姚文元3月28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上。

二

照发。

在第2页上有一点修改^{lll}。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三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的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1] 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一句，原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对康生关于审阅祝贺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电报问题的检讨的批语^[1]

(1968年3月28日)

—

注意到了，就好了。对外刊物和出版方面似有不少问题，可否请康生、伯达、文元^[2]三同志主持召开一二次座谈会，研究改善办法。

毛泽东
三月二十八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1968年3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中联部代中央起草的对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这个稿子我看过了，而且经我批发送审的，我有责任。”“读了主席对电文的修改和严肃的批语，我深自谴责，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多次的教导，又一次犯了错误，这是不能允许的。希望主席予以严厉的批评。今后起草对外文件定当严加注意，坚决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本篇一写在康生的这封检讨信上；本篇二写在这封检讨信的信封上。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
—

送林、周^[1]、伯达、文元同志亲启。

退康生。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 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68年3月30日)

总理、伯达^[2]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

[1] 黑龙江省革委会1968年3月19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总结了从1967年9月开始进行的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二、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委会的这个报告。

[2] 总理，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 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

(1968年)

一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1] 《人民日报》1968年3月3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其中第一段话又在4月1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第二段话又在3月30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 批示稿上的批语^[1]

(1968年4月6日)

退周^[2]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3]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毛泽东
四月六日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3月30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给毛泽东等的请示报告中，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分别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30日同意湖南省革筹小组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语稿上加了一个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3处点的人名，并写了这个批语。周恩来等将中央批语稿及其附件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还写道，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取和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军、干、群代表共8人的汇报时，曾提议结合龙书金同志，并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4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请示报告。

[2] 周，指周恩来。

[3] 杨成武，原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重大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彻底平反。张平化，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197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欢呼柳钢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宣传画）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的一段话

(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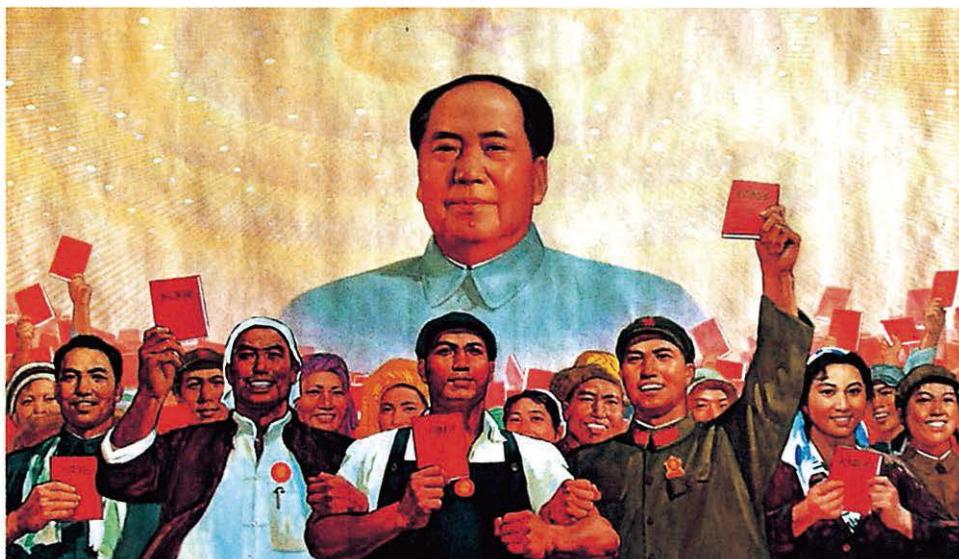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1]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宣传画）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

(1968年4月16日)

—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2]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8年4月16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发表在4月17日《人民日报》。本篇二是写在周恩来4月16日中午送审的声明修改稿上的批语。

[2]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曾获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由此触发美国100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

[1] 毛泽东这篇声明发表的时间是1963年8月8日，载于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

送林彪^[1]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江青、林彪、周恩来在一起。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 《乘胜前进》的批语^[1]

(1968年4月29日)

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下午三时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4月29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上。这篇稿子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在5月1日发表。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1]等的批语

(1968年4月)

有点修改。^[2]

[1] 门合，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四团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当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27人免受伤害，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英勇牺牲。196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报送了代拟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及《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这个命令。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稿和中央军委办事组送审报告的修改，主要是将两件中的“忠于毛主席”改为“忠于人民忠于党”，将两件中的“无限忠于毛主席”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几段最新指示

(1968年4月、5月)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1]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2]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3]

[1]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引用了这句话。

[2] 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中引用了这句话。

[3] 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社论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1968年5月8日)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

[1] 这句话是毛泽东1968年5月8日在接见北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的。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和林彪^[1]等人的一段谈话

(1968年5月11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2]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这是毛泽东1968年5月11日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等人谈话的一部分。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划时代的文献》^[1]送审稿的批语

(1968年5月16日)

可发。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5月16日晨送毛泽东审阅，5月17日发表。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1]的批语

(1968年5月19日)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1] 新华社1968年5月12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上刊载的这篇电讯稿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1968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1]

(1968年5月20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2]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 这段话原载于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6月22日《关于在全军深入传达坚决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和林彪“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这对于加强我军集中统一的领导，促进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1]的批语

(1968年5月21日)

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2]，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3]。

[1] 指北京革命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1968年5月21日关于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这个声明发表在5月22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声明稿中最后一句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声明稿中讲道：“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段中“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及后面的的文字都删去了。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1]

(1968年5月)

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1] 这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5月讲的，载于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转发的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一份《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的 批语^[1]

(1968年6月8日)

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毛泽东
六月八日

[1]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1968年6月4日编印的这份情况反映中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外国专家对他们的住所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没有人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有意见。有些意见确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和一些服务人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引起的，有些是由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不理解，有些则是对我进行攻击指责。6月7日，周恩来将这份材料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七·三”布告^[1]的批语

(1968年7月)

照办。

毛泽东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第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第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第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第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第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第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对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七年度 粮食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68年7月8日)

先念、富春同志：

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毛泽东

七月八日

[1] 国务院业务组1968年7月5日的这个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形势虽然越来越好，但总的说，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无产阶级政治统率业务，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一定要坚决、全面落实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清除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在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要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要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将这个简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他们的信上。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1]

(1968年7月12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7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谈话的一部分。《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而写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编者按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其中的引文作了修改。本篇即是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 《宣传贯彻“七·三”布告^[1]情况》的 批语

(1968年7月18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2]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1968年7月15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等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月3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对“七·二四”布告^[1]的批语

(1968年7月)

照办。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24日的布告。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 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7月)

—

照发。

—

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

—

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7月2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您的提示，我们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就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加了一个编者按，引

用了您的最新指示。现送上，请审阅、修改、批示！”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的“最新指示”原文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本篇一是对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调查报告中所说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的一条批注；本篇三是对调查报告中一句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编者按中“奉劝少数患有近视症而还不是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句，改为“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将调查报告中“破除框框”改为“破除不适用的框框”；将“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劳动实践经验的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一句，改为“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7月22日《人民日报》。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 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1]的 批语

(1968年7月24日)

—

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阅。

[1]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1968年7月16日给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这个报告说，遵照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我们于6月11日至7月6日，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大摆、大颂、大批、大挖的“四大”活动，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二

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毛泽东

七月廿四日

接见首都红代会 “五大领袖”^[1]时的谈话

(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泽东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以下简称江）：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以下简称谢）：恐怕是不肯来。

[1] 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五大领袖”：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5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

韩爱晶（以下简称韩）：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1]，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2]

聂元梓（以下简称聂）：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1] 1968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7月27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清华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5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2] 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以下简称王）：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聂树人^[1]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1] 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以下简称林）：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以下简称谭）：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

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1]，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相见，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1] 周泉纓，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四·一四”组织，简称“四派”，周泉纓是“四派”的理论家，曾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冈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冈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以下简称姚）：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以下简称康）：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

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1]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2]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

[1] “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加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2] 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1]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还有高玉宝^[2]，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

[1] 胡万春（1929—1998），浙江鄞县人。从小失学，13岁当童工，17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1952年开始创作，1955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1956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2] 高玉宝，1927年生，辽宁瓦房店人。8岁上小学1个月，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解放军，1954年他才上学读书，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所著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1955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7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他被周恩来称为“战士作家”。

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以下简称叶）：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

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轻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分？

黄永胜：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玉成（以下简称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分？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1]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以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

[1] 天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

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

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关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人，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

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

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1]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2]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

[1] 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2] 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24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连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1]之分，很复杂。

[1] 地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与天派相对立。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五大领袖”中聂元梓（女）、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女）、王大宾是地派的。

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轻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要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儿。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你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侯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国有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

叫聂元梓（女将），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

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以下简称蒯，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对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对谢富治）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1] 杨余傅，杨，指杨成武，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以下简称陈）：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

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他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做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做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

[1] 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他

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只剩了个马。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

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多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

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1]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1]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

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方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

“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

[1]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1966年12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1967年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朱成昭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2月4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恩来派人抓回，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

大家说：没听说。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

[1] 抢救刘少奇，指1968年7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10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1968年7月)

删去了几个字。

[1] 马来西亚革命者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马来西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为此在1968年7月2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写请示报告，认为“我们不便发表”。报告中两次提到马共内部的路线分歧问题，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党内解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两处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1968年8月5日)

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1]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1] 指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1968年8月5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七条：一、突出宣传军队帮助革委会的巩固和发展；二、大力宣传全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三、深入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五、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宣传；六、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宣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两周年，以及大办民兵师题词十周年；七、加强言论，写好社论等文章。与这份宣传要点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报社临时总编小组8月1日《征求对报纸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的意见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最近我们邀请了10个单位的14位同志到报社座谈，征求他们对报社最近一个时期宣传要点的意见。今后每3个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 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1]的 安排意见的批语^[2]

(1968年8月5日)

(一) 完全同意。

(二) 郑维山^[3]应参加领导小组。

(三) 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1] 毛泽东最新指示，指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

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中央两个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即广西布告）和7月24日的布告（即陕西布告）。

[2] 这个批语写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8年8月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周恩来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10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3] 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 简报^[1]的批语

(1968年8月13日)

—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1] 指解放军报社总编室1968年8月10日编印的《军报生活》第二九二期上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简报，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1968年7月28日邀请部队10个单位代表，就今后怎样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和8月2日邀请西藏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一些同志，就同一主题举行座谈会的情况。

二

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1]

三

官僚主义问题。^[2]

[1] 《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一条说道：“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在“思想战线”四个字下面，毛泽东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思想战线”是《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一个栏目，后来停办了。“思想战线”四个字是由毛泽东题写的。

[2] 《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两条讲道，“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在这两条下面，毛泽东都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红小兵永远紧跟红司令

(四)

广州中学红代会 红卫兵广州总部

1966.6.13.



红小兵永远紧跟红司令（宣传画）



小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纪念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二周年

(一) 广州中学红代会 红卫兵广州造 1968.8.13.

小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宣传画)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1968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

[1]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社论还写道：“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8月14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姚文元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曾在毛泽东的这段话旁注明：“这段引文第一次见报。”毛泽东审阅时，对这段话作了一点文字的修改，并批示：“照发。”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 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1968年8月16日)

这个材料^[1]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8月14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400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 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20日)

照发。

—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祝贺福建省革委会的成立而写的，原题为《团结对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20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这篇社论在8月21日发表。

对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批语

(1968年8月25日)

—

康生、文元^[1]同志：

二七工厂材料^[2]，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

毛泽东

八月廿五日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题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新华社电讯稿，载于新华社1968年8月2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这篇电讯稿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去年10月成立的老革委会和各车间的革委会，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是今年6月20日重新成立的新革委会和各车间的党支部，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工厂两派分歧的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

—

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1]

三

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2]

[1]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开展大批判，也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匆匆忙忙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60%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毛泽东在这两段话旁边画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在这段话下面，毛泽东画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 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25日)

[1] 周恩来等1968年8月25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本篇一写在周恩来等的报告上，本篇二是对周恩来等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周恩来等送审的通知稿写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照发。

二

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 人员在斗争中成长》^[1]写的 《红旗》杂志编者按

(1968年8月31日)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1968年8月29日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这篇调查报告说，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工业战线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发现有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分布在上海大、中、小工厂中，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厂中，工人技术人员要占本单位技术人员总数的80%。他们和广大工人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这支强大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理工科大学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学校要进行教育革命，必须改造现有的师资队伍。上海这支工人技术人员队伍，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有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优秀者来担任大学教员。最近进大学的工宣队中，就有一批工人技术人员。可以肯定，随着学校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将愈益显著。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讲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中的“史无前例的”5个字删去；将由工人技术人员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为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一句中的“人类历史上”5个字删去。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后来都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

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2]同志办。

三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的批语和修改

(1968年8月)

一

照发。

略有修改^[2]。

二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3]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而写的，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16日送毛泽东审阅，8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此外，他还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3] 指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加的编者按。

“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

—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1] 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姚文元8月23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五是对姚文元8月24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六至十五是对这三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2] 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即本篇十一、十四中带引号的文字。这篇文章送审时，原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

二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1]

三

大体可以了。

四

除已写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2]

五

照发。

[1] 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送审稿中说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史无前例的”5个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2] 姚文元在1968年8月23日送审稿上写有：“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毛泽东在“不宜用”3字下画了一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批语中所指的两段话，即本篇十一、十四中的两段引文。

六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七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

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九

这个“独立王国”^[1]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十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

[1] 指上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

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

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这个过程^[1]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

[1] 指上文中提到的“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的过程。

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¹¹¹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1] 引号中的文字公开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批语^[1]

(1968年8月)

此文可用。但从13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闷，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18日送审的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共分5节。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四节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要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和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毛泽东批语中说的“从13页起的两节”，指这篇文章的第四、五两节，发表前作了一些删改。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 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1]

(1968年8月)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8月20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53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 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

—

照办。

—

辽宁省营口县水源公社各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色。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

[1] 这篇《人民日报》批判组的调查报告载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1968年8月2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五九三期。8月31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调查报告报送毛泽东时说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的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本篇二是对调查报告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改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8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越南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坚持人民战争，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

但是，美帝、苏修加在一起，也挽救不了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必然失败的命运。它们互相勾结、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在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苏修越是勾结在一起，世界人民就越看清楚他们是一丘之貉。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大好。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久经战争考验的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只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必将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 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 教育革命》^[1]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1968年9月3日)

[1] 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继1968年8月29日报送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之后，又报送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2000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在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年至三年为宜。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均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

—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

姚文元同志：

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

毛泽东
九月三日

建议普遍开拥军谈心会

(1968年9月4日)

建议将此件^[1]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8月28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四川内江、福建福安和厦门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或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1968年10月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信访摘报转发全军，要求凡担任“三支”“两军”的部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谈心会，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众诚恳对待，多作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 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8年9月4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指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8年9月3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59所大专院校已于8月29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31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万岁》^[1]的批语

(1968年9月6日)

照发。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贺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写的，经毛泽东审阅后，在1968年9月7日发表。

对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9月)

一

照发。

二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1968年9月3日将这份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说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上期《红旗》？”本篇一写在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的话。此外，他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9月14日予以转载。

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

三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2]

四

整个教育制度^[3]

[1]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

[2]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3] 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几个字。

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 一文的修改和批语^[2]

(1968年9月10日)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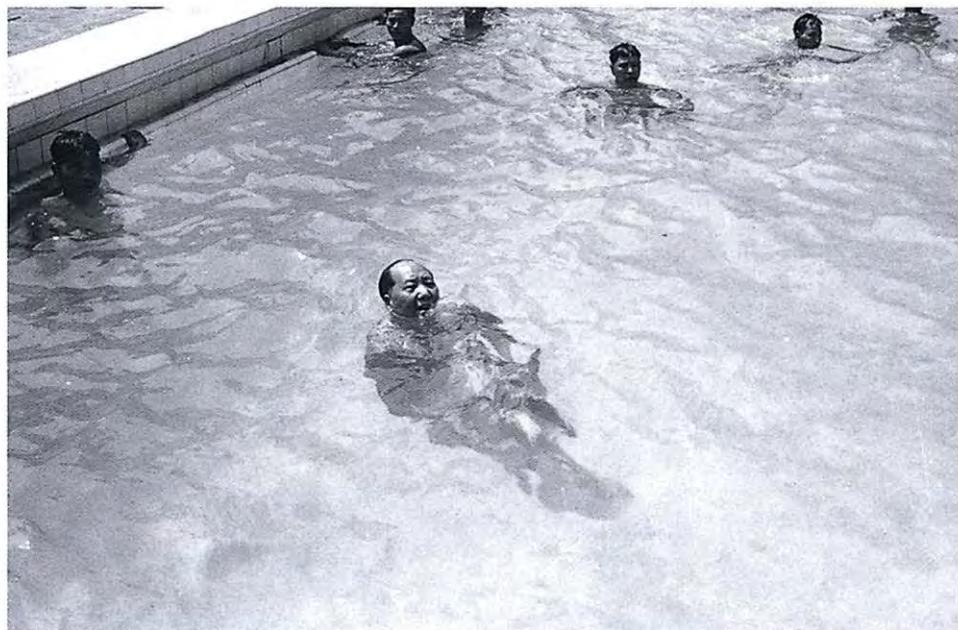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为配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一“《红旗》杂志编者按”而写的，原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2日《人民日报》。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他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9月10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目录页上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道：“送上第三期《红旗》杂志见报目录，请审批。评论员文章如不适用，请勾去。‘赤脚医生’一文中有一段主席重要文字，拟用粗体，附上一并请批。”评论员文章，即《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赤脚医生”一文，即《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都发表在《红旗》杂志1968年第三期上。

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

二

照发。



1968年，毛泽东工作之余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整党建党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8年9月17日)

—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他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已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1968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今天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同我到了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这个厂是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领导成分已有很大更新。过去7个党委委员，有4个被打倒，2个被结合，1个靠边站。现在的革委会13个常委，有10个是党员，其中7人是从一般党员中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经过运动考验，被群众选入革委会的。因为领导核心经过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找的发展对象就较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求入党的新党员由什么人批准？春桥同志和我都认为：“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13个常委中的10个党员）可以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不知可否这样试验一下，请予指示。”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

可以吧。——毛注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 二十九个省、市、区 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1968年9月1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

[1] 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北大西洋公约，指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12国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年8月24日起生效。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相继加入。1949年8月，根据公约规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为部长理事会，最高军事机构为防务计划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还设有核防御军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等辅助机构。

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报告^[1]的批语

(1968年9月20日)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1] 指周恩来和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8年9月19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9月15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300人左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68年9月23日)

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2]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9月22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党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给周世钊的信

(1968年9月29日)

惇元兄：

此信今天收读，甚慰。前两信都未见，^[1]可惜。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2]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3]就此奉复，顺祝康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九日

[1] 前两信都未见，一次是1945年周世钊写到重庆给毛泽东的信未收到，另一次就是1968年周世钊寄到北京给毛泽东的信未见，以致毛泽东表示可惜。

[2] 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指1968年，周世钊读到各种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致函毛泽东，请问应作何处理，哪些注释本比较好。

[3] 对联更拙劣，不可用，指1918年，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手书，由学生刻在竹子上，悬挂在大礼堂的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1968年，有人建议再写，刻上。毛泽东表示不愿意为个人作纪念。遂此作罢。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宣队进入 中小学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8年9月29日)

此件^[1]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1]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9月27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9月5日至12日，我们组织了3.1万余名产业工人，进入10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9月16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196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 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1968年9月、10月)

—

姚文元^[1]同志：

此件^[2]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载于《人民日报》总编室1968年9月2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文章说，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

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

可用。¹¹¹

[1]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1968年10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稿上。按语稿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 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8年9月)

太多。

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11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写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37923人，拟在4个人中抽1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代表。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8年9月)

—

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

这一句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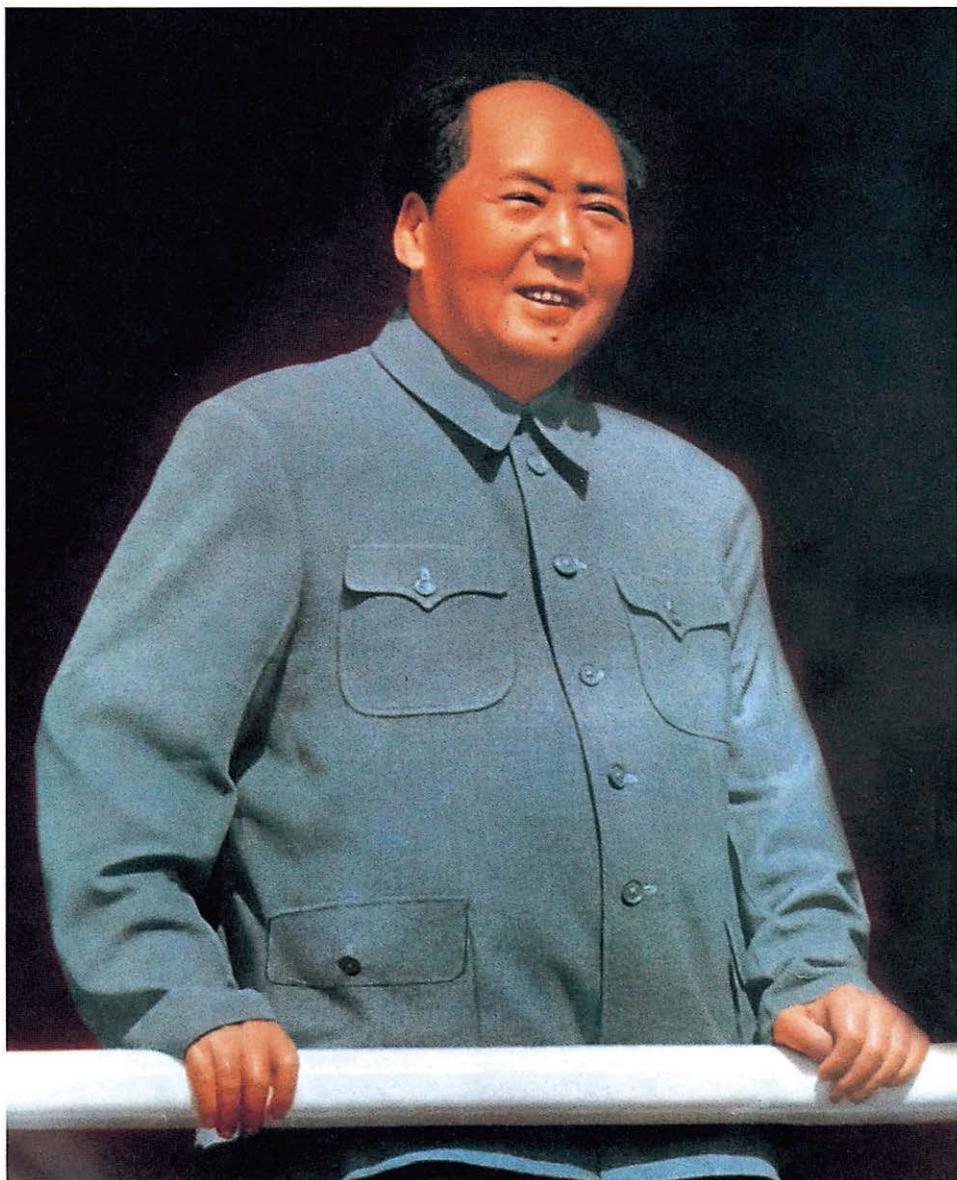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28日送审的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第二页末段说道：“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并写了两条批语，即本篇一、二。10月1日，林彪根据这个讲话稿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上讲话。讲话发表在10月2日《人民日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 奋勇前进》^[1]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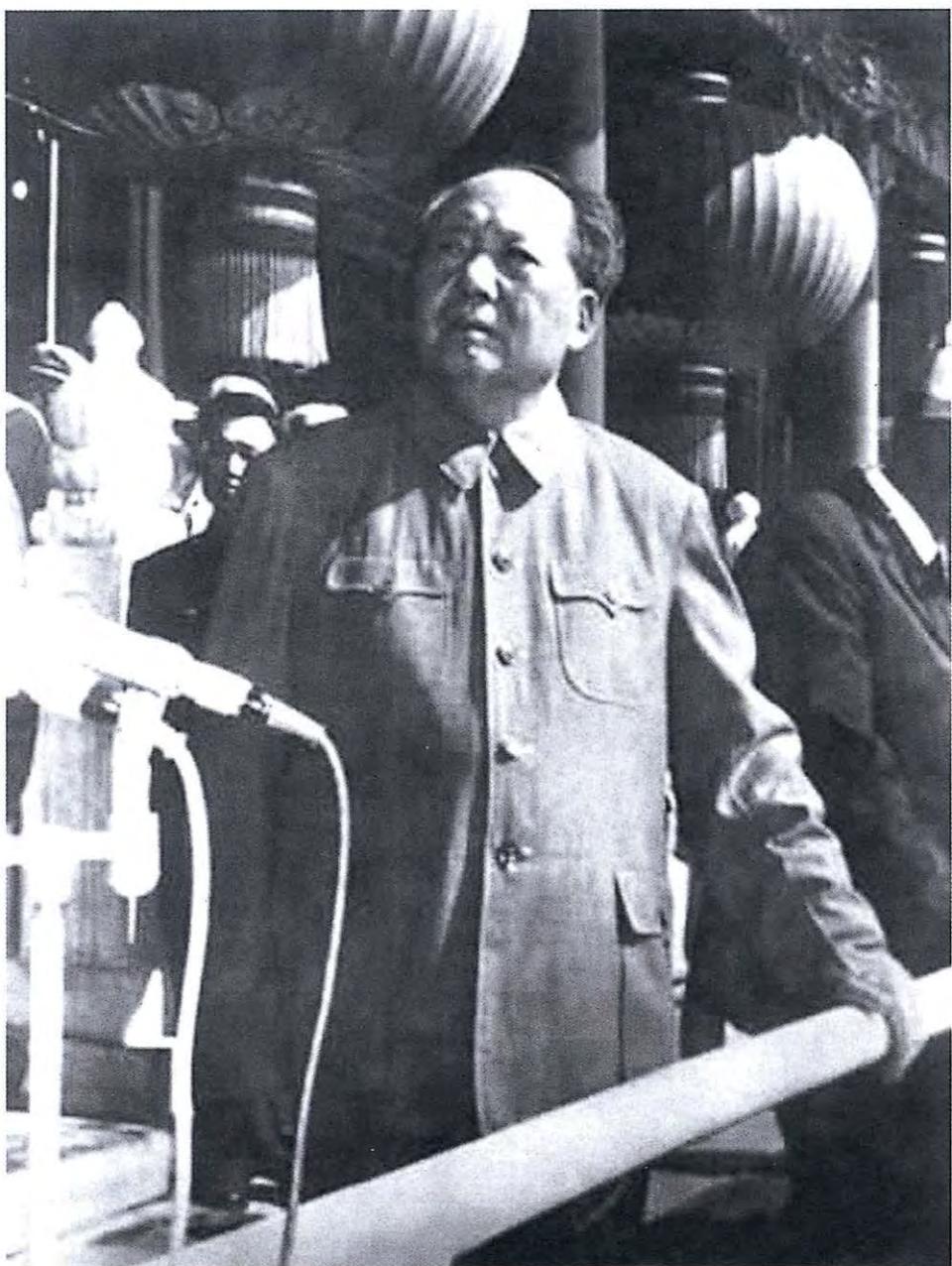
(1968年9月)

照发。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而写的。其中讲到，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篇社论在196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革命群众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来到工人阶级代表中，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华国锋等在一起。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西哈努克在一起。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 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8年10月13日、31日)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

（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1] 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邓老，指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山东谭启龙^[1]，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

（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

山东的同志要做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2]，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3]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4]，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

（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5]，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

[1]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2] 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3] 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5] 邓小平的自传检讨，1968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泽东，全文分为“红七军工作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四部分。

工作也很难做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1]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

（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

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
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
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
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二十二
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
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2]，打了八个月，
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
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肖克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

[1] 韩先楚，当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19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2] 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
会”（简称“辽联”），“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
，“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后经过联合，于1968年5
月10日辽宁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得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

[1] 李德生，当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4月18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是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

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

(1968年10月14日)

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2]。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14日送审的社论稿上。社论稿的副标题为《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现送上，请审阅。”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2] 姚文元1968年10月14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排在第四篇，毛泽东审阅时，将它改作第一篇。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 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968年)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1]

—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2]

[1] 在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

[2] 《红旗》杂志这篇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10月17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段话。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1968年10月15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敬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您六十寿辰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缔造者，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您的正确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您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深入地持续地开展革命化运动，同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同志，您的光荣的历史证明，您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

中阿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经过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考验的。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让我们两

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苏修而并肩战斗！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祝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对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 调查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0月)

照办。^[2]

[1] 指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1968年9月15日写的调查报告《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报告说，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3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2]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25日送审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公报稿的批语^[1]

(1968年10月)

—

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

—

此句此地不用为宜。^[2]

[1] 本篇一、二写在1968年10月28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三写在10月30日送审的公报稿上。这个公报10月31日经全会通过，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1968年10月28日送审的公报稿中写道：“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公报稿的这一段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唯一”二字。

三

有一点修改。^⑩

[1] 毛泽东对1968年10月30日送审稿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以下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1969年）

—

印发十二中全会^[2]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3]。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12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先送主席看看，是否基本可用？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在康生等10月12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周恩来等10月26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写在周恩来等11月2日送审的这个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五是写在周恩来等1969年3月1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六是写在康生1969年4月9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七是对1968年10月12日、1969年4月9日送审的党章草案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3] 毛泽东对康生等1968年10月12日送审的党章草案的修改，除本篇七外，还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3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二

已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三

有一些修改^[1]，待议。

[1]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10月26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决定稿中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对同时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毛泽东也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的“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再次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3个副词。此外，还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四

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1]，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2]。

五

已阅。退康生同志。

[1] 指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草案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毛泽东审阅时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在1968年10月31日通过，11月3日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一起印发全党。

[2] 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

在第七页上增加了三个字。

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1]，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1] 这句话原为：“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1968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

[1] 1968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这个公报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

(1968年10月30日)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彪同志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

龙、江渭清^[1]，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做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2]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3]。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

[1] 谭启龙，1970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2年4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1974年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2] 邓华，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3] 黄克诚，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1965年，黄克诚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农业。谭政，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9、10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1961年1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1975年8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2]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二十四元，最多的给四

[1] 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2]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6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2]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

[1] 范老，指范文澜。

[2] 郭老，指郭沫若。

市，不平衡的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做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国荣、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座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

史。谭家桢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二十元，多的四十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做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却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三十二岁。）你好像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三十八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做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吗呀？结果搞得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洗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洗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洗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江霖，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五十二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

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

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邓不过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68年11月4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11月4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用黑体字引用，载于1968年11月2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和11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1]

(1968年11月10日)

一

一个是钢铁，一个是机械，一个是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二

自己搞，有个十年八年，最多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我们的国家吃过这个亏。蒋介石那个时代，他是什么都不搞，一切靠外国。那个时候，包括清朝末年，几十年只搞到年产几万吨钢。所以他丧失人心。他跟日本人打仗也好，跟我们打也好，主要靠美国。过去是靠英国，后来靠美国。他现在呆在台湾，有时也骂美国，但实际上离了美国，他一天也不能活。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三

我们现在比蒋介石统治的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产值按人口比例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等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

四

希望你们几十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不靠任何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靠自己。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以。

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啊？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 情况简报^[1]的批语

(1968年11月14日)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11月13日向毛泽东等转报的这份情况简报，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某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1972年五六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曾将此件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 《要信摘要》上的批语^[1]

(1968年11月15日)

—

送黄永胜^[2]同志酌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8年11月14日编印的《要信摘要》第四〇八号上。摘要说，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政府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泽东一信称：“我有不少危害人民的罪行。为了对党立功赎罪，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的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万余字。”他还说，“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撤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阅看时，在这句话旁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1]

(1968年11月17日)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谈话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灾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它又要恢复轰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

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1]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还是阮友寿？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

[1] 约翰逊（1908—1973），美国民主党人，1963年至1969年任美国总统。

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8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你们英雄的国家解放二十四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四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续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阶段。这个运动，大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

级专政。你们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坚决支持世界革命，坚持不懈地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苏修叛徒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们无情地揭露了苏修的侵略面目和美苏勾结的罪恶阴谋，毅然地宣布退出苏修一手控制的、已经变为侵略性的、反社会主义的华沙条约^[1]。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英雄气概表示无限的钦佩，热烈地祝贺你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亲爱的战友们！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发动猛烈的进攻。美帝和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我们坚信，中阿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被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必将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6月4日起生效，有效期20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的阴谋，必将推翻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胜利是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的伟大战斗友谊，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经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我们再次向你们表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坚强后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的反帝反修斗争。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在反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携手前进！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1]

(1968年11月28日)

—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希尔（以下简称希）：我看它们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看来它们一时不会打，至少它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力量发动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大多数人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它们已失去判断的能力，有发生很大冲突的危险性。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暂时还发动不了这场大战。

毛：要打仗，美国、苏联这两个大国可以打，其次是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至于英国和法国，它们不大想打。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戴高乐^[2]的军事预算还减了一点。

毛：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西德想吞并东德，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其实日本还没有独立。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主席希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周：美国在军事上控制它们，在那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搞几年后就起来了。

周：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

毛：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当时这些国家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还听政府的话。德国那么大的一个共产党一下就垮了。

周：意大利的共产党垮得更早。

毛：社会民主党也完了。希特勒成立了国社党^[1]、冲锋队。

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了两年后才动手，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西德。美国在南越有五十万兵，在南朝鲜有两个师共七万多人，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当然垄断资本家还是有它的打算的。

周：可以赚钱。

毛：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包括澳大利亚的垄断资本家在内，也希望出点兵，但兵却不多。

[1] 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二

毛：这样看，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要打仗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会面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

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很高兴，还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那么很高。

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1]的理论是核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胜利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说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当，真正要打大仗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个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特别是飞行员。

[1] 赫鲁晓夫，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三

毛：从你们国家到香港要多少时间？

希：飞行要十多个小时。从澳大利亚到香港有四千五百英里，大概七千多公里。

毛：这个世界我看要统一。又是英里，又是海里，又是公里，又那么多语言，但语言一下统一不容易，只要世界统一了就好办了。这个地球总有一天要统一的。

过去的蒙古、西方的罗马、亚历山大、拿破仑、大英帝国，现在的美国跟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日本人想统一太平洋，都没有得逞。这种可能我看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强迫世界各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统一方式。第二种，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然后联合起来，我看会统一得了的。由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来统一世界恐怕也不容易。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但是这两个国家人口少，一分散就不够用了。它们也怕打原子战争。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怕消灭本国的人口。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什么美元、英镑、澳元、法郎、马克、卢布，都统一起来，还搞这些差别干啥呀？

越南战争跟朝鲜战争有个不同之处，整个欧洲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英国、法国、土耳其、比利时都参加了。

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

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

同意转发北京军区贯彻执行 “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8年11月)

可转发。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1968年10月29日的这个报告中说，我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使部队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取得了新成绩。其中，今年全军区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7300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9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业。11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时写道：“军委办事组讨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拟转发全军。”毛泽东在这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1]

(1968年)

此件照办。

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2]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3]似也可发表。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姚文元的这个报告上。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革委会、长阳县革委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

[2]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从1968年12月2日专栏第七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开始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这个讨论专栏后来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共一九七期。

[3] 指著名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 “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2月1日)

—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社记者关于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报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1968年11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等。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北京市革委会送审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新华印刷厂经验报告中加写的两条注。12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揪出所谓“六十八名阶级敌人”问题，中共中央1979年9月28日批准的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1968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二

这个厂^[1]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

三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毛注^[2]

[1] 指北京新华印刷厂。

[2]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讲到，这个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还准备在全厂范围内让他作检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注。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1968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站在反美鬥爭最前線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發揚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帮助美帝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正在加紧同美帝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但是，美帝、苏修的一切阴谋诡计，在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

面前，是不会得逞的。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相信，三千一百万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其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1]

(1968年12月)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1] 中共中央军委1968年12月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口号，并写了这个注。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 领导班子调查报告的批语

(1968年12月)

建议将此件^⑩转发各地参考。

[1] 指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196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为作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组织1100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从已调查完的34个县的3598个社、队领导班子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好的，占20%左右；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60%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13%~15%，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调查情况表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支农部队应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2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 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8年12月)

照办。

[1]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秉璋等1968年12月7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写报告说，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4月批准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计划，应继续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确信可以保证总装质量，要求尽快进行飞行试验，向“九大”献礼。特此报告，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军委办事组12月12日转送的送审报告上。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1]的批语

(1968年12月)

可发。^[2]

[1] 指《甘肃日报》1968年12月10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178户932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12月2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2月19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前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道：“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1968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

[1]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 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 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12月)

—

有一点修改，付讨论。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2月17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第二条写道：“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即本篇二。通知稿第四条中写道：“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三。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二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三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 要大联合的意见^[1]

(1968年至1969年)

—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1] 本篇是毛泽东1968年至1969年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4条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党委1969年7月26日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4条指示。这个报告后作为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附件《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7月29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附件。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语稿时曾批示：“照办。”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969



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1] 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

(1969年1月3日)

—

内有批语^[2]，请黄永胜^[3]同志办理。

—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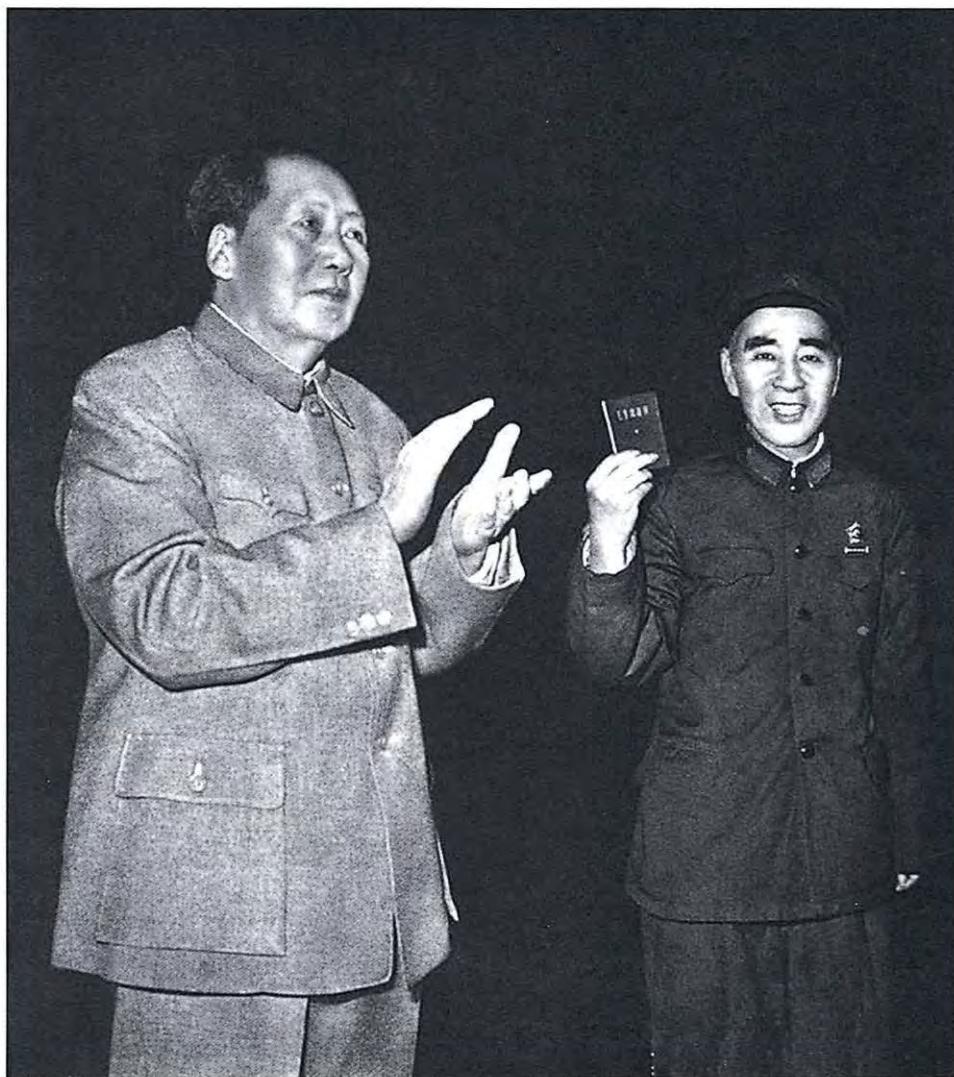
[1]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2] 即本篇二。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12月26日报送的反映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前情况的材料上。

[3]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系搞好。

毛泽东
一月三日



1969年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 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 政策报告^[1]的批语

(1969年1月28日)

照发。

[1]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年1月20日写的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1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等。1月28日，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那五条不错，可以转发。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打仗就是要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1]

(1969年1月28日)

现有的这些设防一大半可能无用，打起仗来不依照这个道理。马其诺防线不是突破了吗？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把许多兵力陷进去了，机动兵力减少了。

有些人对敌人的空降、空袭向来是不注意的。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你的后方，做工事还要防空降、防空袭。

工事也许有些用，也许用处不大。有些工事在一两个星期内挡一下可以，有的工事可以挡久一点，挡半年，下半年怎么办？还是要撤。工事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挡一下，一种是可以挡久一点，其余的大部分没有什么用。敌人从哪里都可以来，为什么要往钉子上碰呢？比如，苏联出兵东北，走白城子这条路的，敌人毫无抵抗；走东边那一路的，打到临江附近时，在牡丹江吃了亏。

我们打仗从来就不顶，敌人要来就来，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第五次反“围剿”顶了，顶掉了一个中央苏区。

我们的工事做得多了，将来大部分没有用，势必要放弃。你守着工事等半年他也不来，结果在别的地方来了。把主力摆在那里，等半年、一年不来，怎么办？英雄无用武之地。

南方有草还好些，北方可没有草，不过七八年有些工事可能就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汇报时谈话的要点。

垮掉了。

敌人来打仗干什么呢？从来打仗就是要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苏联进东北，就是要消灭日本关东军。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首先消灭军队，然后再占地方。不消灭军队就毫无办法。

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的问题。在战场上要占领制高点，做点工事就可以了。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1]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2]

(1969年1月)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3]二人不宜为代表^[4]。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要》上。摘要说，1月10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3]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

[4] 指中共九大代表。

如梦令·韶山冲*

(1969年1月)

扶桑，丰田，龙潭，
幼年凫游星汉。
而今何处循？
梦不见横须贺。
何处？何处？
无奈石灯阑珊。

在讨论农村商业 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1月)

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席批示，要我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我在十四日晚召集上述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军管人员、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大联委负责人共三十多人座谈了这一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和信用两合作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收购均通过社队的购销服务社、站经营，国家商业只在县市城镇设立批发、收购站和国家商店。粮食、油料的购销，在农村拟晚一步下放。”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报送了国务院值班室1969年1月11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业务组1968年12月6日关于供销合作社系统人员机构的基本情况（汇报材料）和商业部军代表1968年12月19日关于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好（调查报告）”的综合报告等3份材料。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 做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1]

(1969年2月)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1] 周恩来1969年2月5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曾出席十二中全会、现被提出或未被提出作‘九大’代表问题，本拟在会谈中面报主席和林副主席，请作最后决定。现因会议推迟，特先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已审定的书面文件送呈一份请阅，便于主席预作考虑。”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陈奇涵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指战员。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1969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¹¹¹

[1]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1969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1]

[1]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 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

(1969年3月15日)

—

沈阳怎么样？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它，我们准备住乡下，不给它一点面子它是不来的。它打仗无非是要点面子。要作准备。平时常备军太多了，打起仗来兵力又不够。东北每个县都应组织一个营，两个营以至三个营，打仗时，这些营可以变为独立师。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三个营。全国两千一百多个县，平均每县两个营，就有四千多个营。打起大仗还要继续提高生产，因此兵力不要太多，太多了没有用处。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苏美一口吃不下。我们给他们一点面子，让他们占一些地方。他们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打进来几百公里，几千公里，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关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地方武装要像割韭菜一样。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三个营，可以不断地生长力量，生长主力部队。它进来了，就说明它的领土野心。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了，我没有到你那里去，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样政治、军事都有利，有充足的理由，这是形式逻辑。我们的文斗办法是以理服人，说理斗争。不让它进来，不让它占领我们的大城市，力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我没有打到你的海参崴，没有打到你的伯力、赤塔，你打到了我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你就没有理由了。你占领你的，我打我的，地球总是照样转，你进来它转，你不进来它也转，人是搞不干净的，消灭不了的。你不可能从地球这边打进去，那边打出来，把地球都打穿了。苏联现在搞珍宝岛是出于他们国内的需要，全国可以搞游行示威。如果真正打你，他们就不搞游行了。他们的炮打进我国土七公里，我们何必也去打他个七公里呢？给他们一点面子嘛！

二

不抓紧机会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要看哪个地方。有的地方可以先搞起来。不要把兵扩太多了，有碍生产。首先把东北搞起来。

三

南方各省都要准备两手，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打仗。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他们没有来，我们作好了准备；他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吃亏。没有准备就要吃亏。

四

美苏勾结，扩军备战，想重新瓜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是二十三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二年。

尼克松^[1]一上台，就到欧洲去，实际上是搞扩军备战。

总感到要打仗。美国的国防预算今年是八百五十四亿美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苏联今年的国防预算是一百七十七亿卢布（去年一百六十七亿），也是历年来最高的。搞那么多军事费用干什么呢？总感到要打仗就是了。日本呢？它利用这个不扩大现役军队，所以它的国防预算只百分之一、二、三，这么一个小比例。美国就对它施加压力，希望它成为作战的伙伴。

尼克松现在进一步说了，由于中国强大，对中苏的反导弹基地必须要建立。尼克松到欧洲压迫西德，派人到日本压迫日本，好便于美苏勾结扩军备战，他们好指挥一切。我们看既然这样扩军备战，那总是有目的的。

世界革命运动蓬蓬勃勃，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亚非拉，从学生到工人，到一部分农村，像意大利这样。

摆在我面前的前途有两个。要么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起来，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统治埋葬了；要么是他们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样，使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接着他们自己的统治被推翻。这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是两个前途。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立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

至于苏联现在在乌苏里江的挑衅，还不能联系到大战，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就是了。但我们看了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到前途，看到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它甚至想首先消灭中国的原子基地。

苏联从来也没有在边界冲突上丢过这样的脸。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让它得逞呢？但是它总想挑衅，想占点面子，不仅是今年，几年来都不断地发生。

大敌当前，就是最好的动员。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 《关于总结经验》的批语^[1]

(1969年3月)

在碰头会上讨论后再发表。

[1] 《红旗》杂志这篇社论稿原题为《总结经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关于总结经验》，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他还对这篇社论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主要是将“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改为“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高的”；将“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10个字删去；将“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高度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一句，改为“毛主席这个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这篇社论，发表在1969年3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人民日报》3月15日转载。

要认真总结经验^[1]

(19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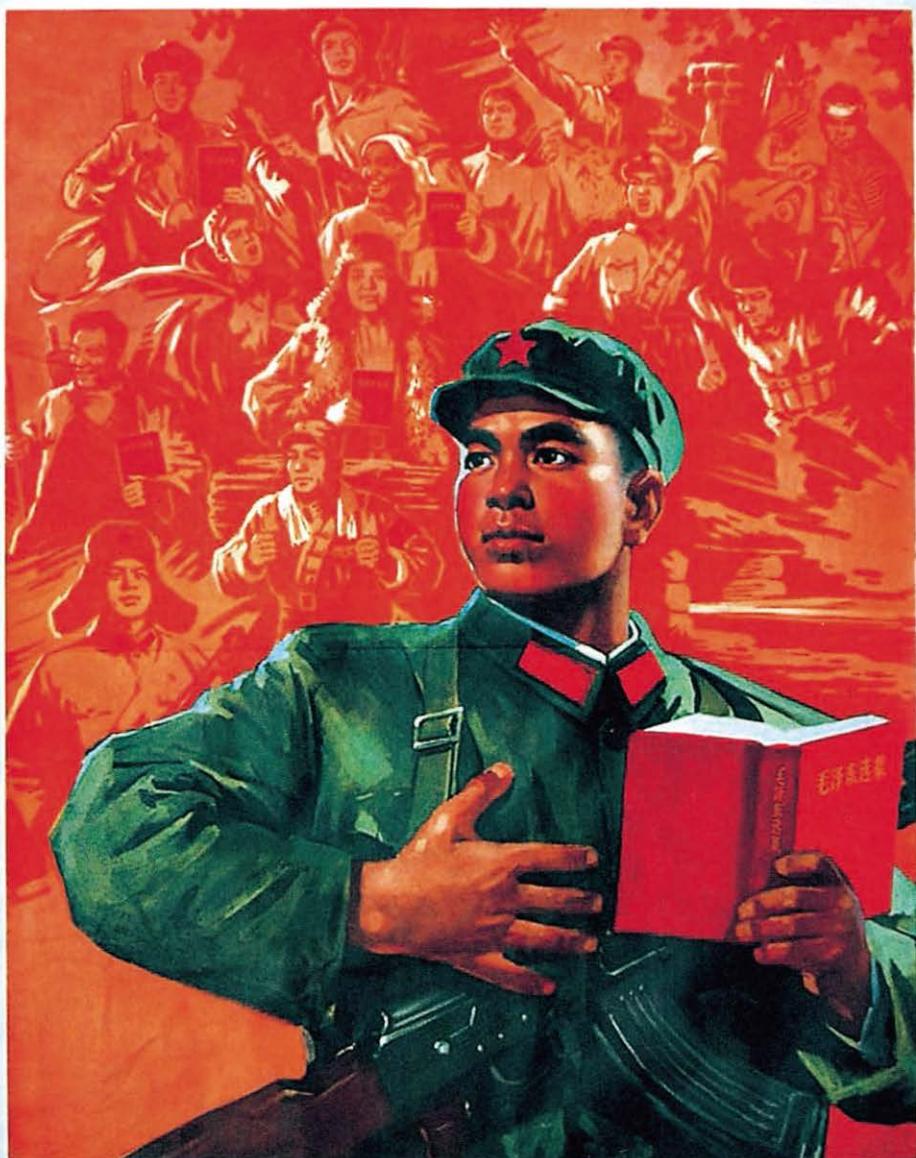
—

要认真总结经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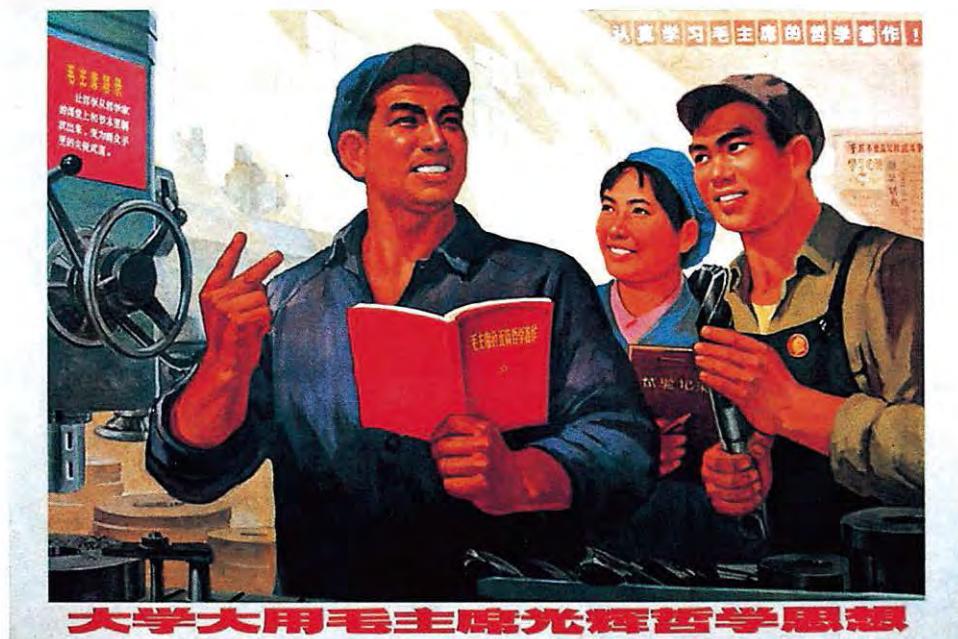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1] 1969年3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在“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本篇一、二中的话。《人民日报》3月15日转载了《红旗》杂志这篇社论。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宣传画）



大学大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宣传画）



《亲切地教导》(版画)

对林彪^[1]中共九大报告稿的 批语和修改^[2]

(1969年3月、4月)

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1969年3月16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本篇二写在3月21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四、五部分上（第二、三两部分已在此前送审）；本篇三写在3月25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四、五分别写在3月28日送审的两份报告修改稿上；本篇六写在3月31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七写在4月7日送审的修改稿上；本篇八写在4月10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九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等4月25日送审的报告和党章的文字校正稿上；本篇十至十七是对历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4月14日，中共九大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报告全文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发表在4月28日《人民日报》。

二

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

三

看了一遍，略有修改^[1]，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四

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2]。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下午四时

[1]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5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七外，其余都是个别文字的删节。

[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8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十一外，还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魄，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五

此件看过，另有批语^[1]已先送阅。

六

林彪同志：

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2]，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3]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毛泽东

三月卅一日下午二时

[1] 即本篇四。

[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31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二至十六外，还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次送审稿中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分别讲的是关于我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经毛泽东调整顺序后，在公开发表时，分别为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被毛泽东改为第五节的末尾一小节，在公开发表时为报告的第八部分，小标题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3]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七

林彪同志审阅。我看这样修改较好。只在第24页上作了一点修改^[1]。新排本^[2]留下待看。此件请你阅后退还张、姚二同志。

毛泽东

四月七日廿三时

八

已阅。

九

可以。

[1] 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4月7日送审稿第24页上写道：“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改为“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

[2] 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4月7日的送审报告中写道：“这里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把修改处注明或剪贴上去的本子，一种是修改后新排出的本子。”

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十一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十二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十三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十四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十五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1]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10月5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文字。引号中的全部文字在公开发表时都用黑体字排印。

十六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1]

十七

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2]。

[1] 这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31日送审稿第三节前加写的一句话，第三节后被毛泽东改为第四节，公开发表时又改为第七部分，题为“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2] 在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5日送审稿上，这句话原为“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

在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 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3月31日)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2]，请考虑酌定。

[1] 周恩来1969年3月31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徐海东，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参加主席团，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时，他们都在主席台上就座。

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 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1]

(1969年3月)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1] 周恩来1969年3月22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从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经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面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外交部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

在周恩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3月)

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1] 周恩来1969年3月29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汇报了中共九大准备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安排。报告最后说：“在廿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115人，候补中委95人，共210人），请大家考虑，然后再考虑具体人选或范围。”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和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1]

（1969年4月1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2]，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3]，湖北的代表陈潭秋^[4]，湖南的代表何叔衡^[5]，上海的代表李汉俊^[6]，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7]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8]，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9]、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10]。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1]，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2]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3]

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4]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5]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6]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篇和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5月9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 董老，指董必武，1921年7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3] 王尽美、邓恩铭，1921年7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1925年8日因病逝世。邓恩铭1928年年底被捕，1931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 陈潭秋，1921年7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9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

[5] 何叔衡，1921年7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赴上海途中他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6] 李汉俊，1921年7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他自动脱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汉俊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7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李汉俊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7] 陈公博，1921年7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被处决。周佛海，1921年7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45年9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狱中。张国焘，1921年7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刘仁静，1921年7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1987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8月因车祸去世。

[8] 李达，1921年7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6年8月含冤逝世。1980年被彻底平反昭雪。

[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30多人。

[10]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0多人。

[1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

[12] 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3] 瞿秋白，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李立三，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7年6月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明，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4年，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1974年病死在莫斯科。

[14]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1976年7月含冤逝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稼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1月逝世。

[15]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于1968年9月向中央报送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于10月由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这次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

决议。1969年10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11月12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16]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被捕。1935年刑满出狱。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1945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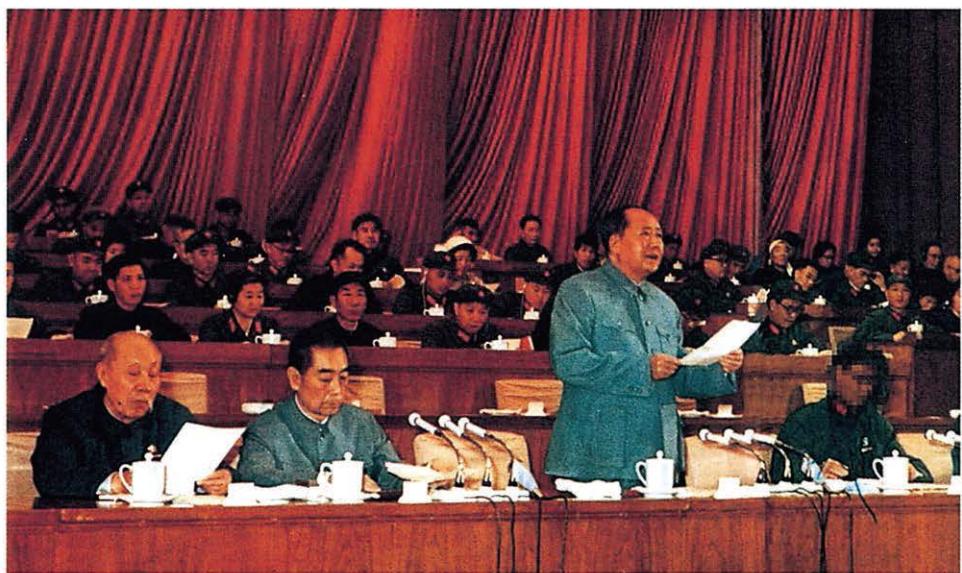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讲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七亿人民七亿兵（宣传画）

和谢富治等的谈话

(1969年4月5日)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

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还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代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六十三军就不要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六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副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第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

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嘛！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搞，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像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

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是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的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拔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两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

（1969年4月11日）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在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

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七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杆，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

能触及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南口有个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判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的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涵、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

（1969年4月13日）

有什么消息呀？（周恩来：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

这要传达干什么？（周恩来：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

不是，我讲的事是否符合事实。（周恩来：都符合的。）（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

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李雪峰：苏区党代会，有个学生叫杨诚说，抗日抗日，民主民主。）（康生：是十二月会议。）（程世清：我们发现，主席未发表过的三篇文章，一个是《告前线将士书》。）那恐怕不对。（程世清：报上发表过。）（陈伯达：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也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农村调查序言》《论政策》两篇文章写入了。）这个《论政策》有吗？（陈伯达：有。）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

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

总工会刘少奇。（周恩来：留下的还有向忠发、项英。）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周恩来：有个人姓蒋，叫什么先，还有个特务营。）他相信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篇校长训词，因为这个人我熟悉，他在长沙师范，后来又在安源。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

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不算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

我说的是江西AB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这个送信人叫朱□□，他躲在山上，现在内务部的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

把他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周恩来：有的。）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既与国民党决裂，就决裂吧，就一切斗争，没有联合了。如城市里的小作坊都得没收。富农该联合，也不分阶层。资产阶级要分阶层，空喊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打倒，还在城市，只要不反对，一概不论。

筹款还是要筹的，帝国主义、洋行它不来了，口号喊喊而已，我们住在乡村也像城市，政策方面是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作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出发时大了，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以后基于我们党不要分裂，罗章龙湖南人哪，我相当熟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这么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罗章龙没有搞几天嘛。（周恩来：对，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许世友：他三〇年末去的。）

那是以后了，我认识他很早。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相当熟。他在长辛店，五四运动以前教职工夜校，他当教员，我跟他发生关系。一九一八年一次大会，湖北英山，刘元震。（江青：张国焘很早是叛徒，有大印。）那可能是真的，但影响是大的。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

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不到，刘

元震当他的代表，那时反的不少，刘元震、李立三、张国焘，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安源，一个在北京，总的在北京。那个反对是不对的，当中央一查，不少独立性，有没有？（董老：本来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现在还要增为营教导员，连支部、团、师都有政委。在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你决裂吗，不管你小资本家一概打倒。列宁说富农都没敢……但中国的富农不发达的，雇、贫、中农也赞成按人口分地，按人口平分，后头“六大”就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有些城市，大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等。但两次打，两次打不开。可以不打了。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段安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于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想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到中央去请示，请不回去……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张打。要到后边去，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要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黄永胜不知道这些事，你那时干什么呀？（黄永胜：当排长。）项英来后当营长，（黄永胜：当团长了。）升得那么快呀！

(黄永胜：是个小团，等于营。)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呀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打仗的时期，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得到许多教训。打摩擦仗。有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中小城市那就破坏了，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你跟它就办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我与陈叔通说……他小貿不赞成，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把他们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有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些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江青：是。)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

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

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

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大家笑）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哪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二百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十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周恩来：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

讲话。)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大家笑)(周恩来：一点不透风也不好。)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

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周恩来：六七亿。)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分，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许世友：也不赞成的呀。)你那么多工厂管得了吗？要搞发个公布嘛！并找一个时间不是几个人讲话吗？(周恩来：都是谁讲呀！纪登奎搞了喷气式。)(叶群：身体、精神都好了。)可见病也可以治好了。还有一个更惨。几个负责人，康老、伯达讲不？(答：讲。)不要讲长了。你们一讲就长了。(周恩来：有稿子。)(康生：是不是讲呀？)你说第二天再来，人家几分钟，不要那么死。康老、总理、黄永胜，你们讲话不要太长了。(康生：不超过十分钟。)我有个办法，一天开不完两天、三天，我每一天不超过三个钟头。(康生：党章读不读？)不要。那是形式主义。

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我当过校对的，小报越小越容易错字，那是几年的事了。搞《湘江评论》时，那时资产

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

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王洪文：很难呀！）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一个陈其康，他不选王明，“七大”时，还有蒋光鼐……是黄埔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兴国，躲在刘乡村，消极了。我们红军下井冈山，到兴国后，请客吃饭，又出来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选他。（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赞成你们这一点的。（大家笑）

王维同志，（王维：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有一期报（张国华：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报，可能是国民党的报。）是国民党十全大会，叛徒其中□□□、□□□选上了。我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提的这些人，在他那里可以是评议会的。我们又没有评议会，只好到一起。不晓得怎么没有傅□□。（国民党开了十全大会，那儿有几个叛徒，是有的，但有些人没有，还不知道有个傅□□。）（□老：可能死了。）也没有叶青。（周恩来：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闻天、王稼祥。）（康老、董老：烂了。）（周恩来：还有杨勇。）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景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取一技之长。

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康老：曾思玉注意一下。）（许世友：王景山开除了党籍。）（黄永胜：康□是他提的。）（许世友：王景山能打，过得硬。）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你们政委是谁？（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周恩来：陈先瑞做实际工作。）你（指李雪峰同志）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李雪峰：也参加会。）（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四）

（1969年4月14日）

（毛泽东和林彪健步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章程有三项：

第一，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周恩来发言后，林彪发言。五时二十七分）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五时三十五分）康生同志讲话。（五时五十八分）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六时十二分）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六时十九分）怎么办呀？同志们（指摄影记者），别那么忙，你们都是很忙呀，叫作争分夺秒、你追我赶。

（第一位记者进来了）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六时二十九分）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三月十五日战

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孙玉国向毛泽东敬礼时，毛泽东、林彪起来鼓掌。六时三十八分，孙玉国讲完后，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你多大年纪？（孙玉国：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你是哪里人？（孙答：东北人。）东北人呀？你老呢？（孙答：河北。）河北啊，他的名字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国家的国。他是副营长。负伤以后，珍宝岛十五号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指挥的。（孙玉国讲话以后）怎么尉凤英也是辽宁的？尉凤英同志请讲话。（六时五十分）怎么办？别忙。（看表）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恩来：是河南的。）请你，我的老朋友。他是河南的，他本人是山西人；一向在河南工作，也受到一些灾难啊，就是嘛。你讲。（七时两分）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不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全体代表：赞成！热烈鼓掌）我们代表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热烈鼓掌）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举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后）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一致举手）看来也有希望了，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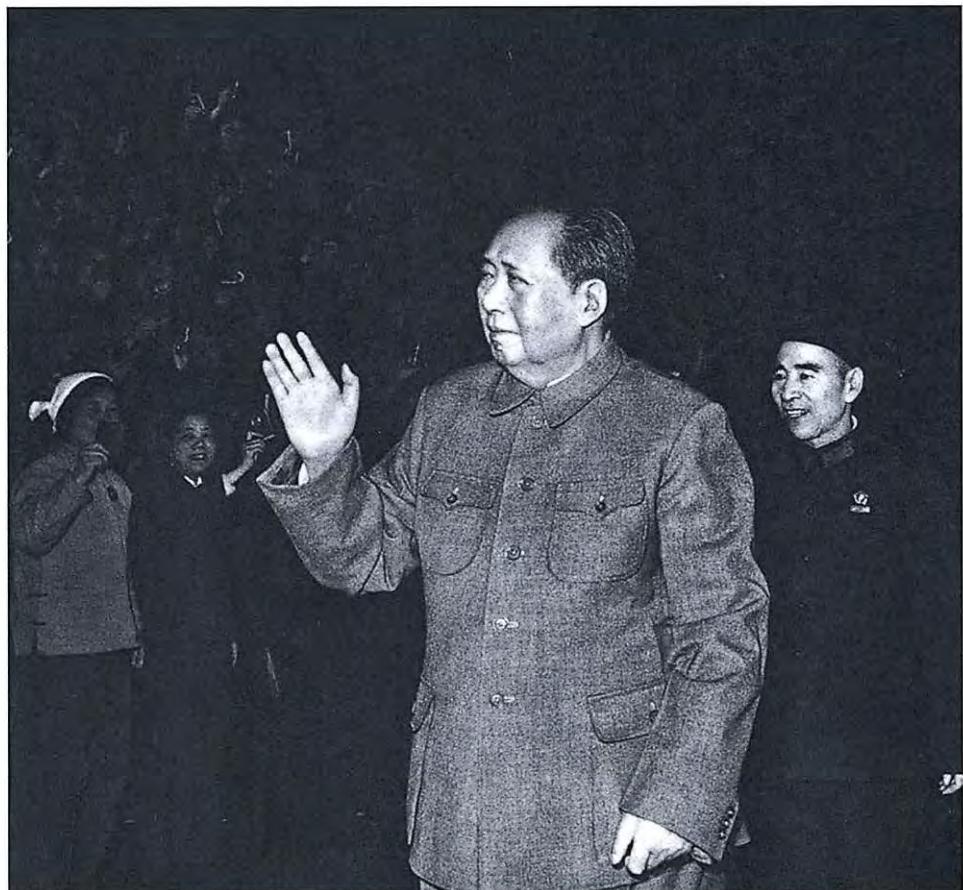
吃饭，散会！（七时五分，结束）



1969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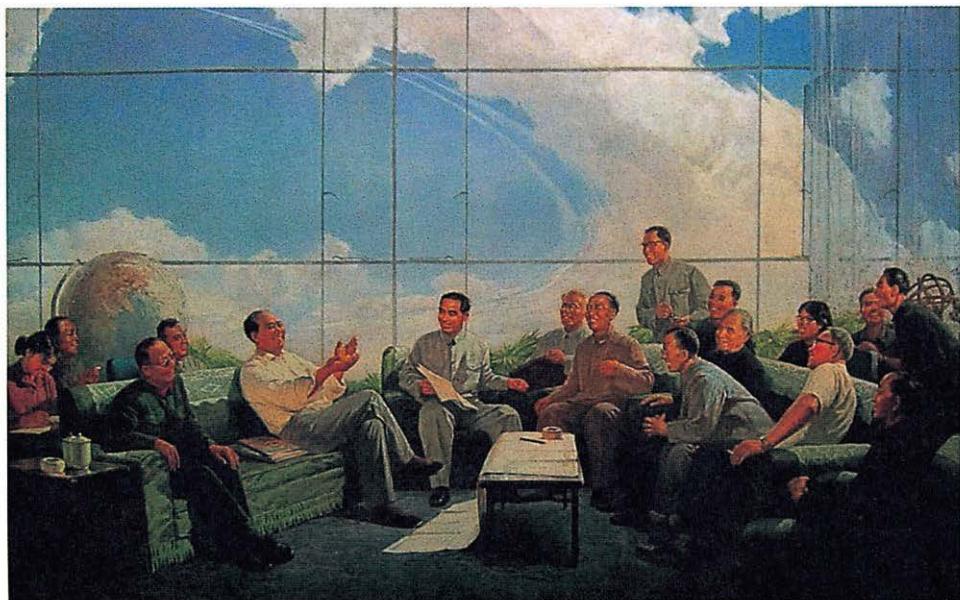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9年4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9年4月，毛泽东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亲切握手。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油画）



《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画)



《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油画)



《毛主席接见铁人王进喜》(素描)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1969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宣传画）

[1] 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林彪的报告4月14日在大会上通过，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1969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

[1] 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林彪的报告4月14日在大会上通过，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曾经讲道：“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五）

（1969年4月23日）

李旭英这个人过去好得很。这里有山东同志没有？野战军、华北有几个？（有人说：六个。）六个军只出了一个曾三圣，三圣有请……。其他已“支左”。山西还有张日清。有的军队没有一个，并不意味着别的军队差一些，而是已兼了革委会主任。再说明，没有利用的好人还多。有的如好几个老同志，反而上了名单，恐怕那一个时期也会有的。比如程其康、张云逸这两位老同志，也就是因为资格老。总而言之，排上了的，大多数是好的，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但不一定太神秘，都那么理想。如八位到十位在中央工作，犯过错误，过去也犯过严重错误，你说不排入能行吗？头一次进中委的占大多数，这是第一次。“七大”没有，“八大”没有。八届的老人占五十三，新排上的两百多，老的五分之一不到，则产业工人与农民增多了。

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

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黄永胜：算农民。）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黄永胜：小团。）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周恩来：农民只搞两头，免去中间，如吕玉兰。工人好办，规定劳动时间，张富贵到处跑，到处检讨，没有劳动。）（康生：他也执行了刘、邓路线，也反了红卫兵，看到天安门上主席接见红卫兵，他赞成了。）

斗完就劳动，群众谅解了。一方面需要这些同志，工厂农村同志，一方面我们需要这些积极分子。有的省提不出人，他不熟悉，证明工作有问题，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其实有些事务不管也可以。太多了也不好，不到三百人，二百七十九人也可以。剩下五百人就扩大化了嘛，公道不公道，我也不清楚，大体如此。要说完全公道，我也说不清楚，说不出个道理来。你们提得有理嘛。（有同志插话：五本也难摆平。）一个组几本够吗？一个人发一本不好吗？人家当一个代表嘛。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大家笑）

胡康呢？（有同志插话：刚入党。）四川有，四川那么大个省，你们提了几个呀？（答：十个。）山东五千万人，（有同志说：两个江苏哩。）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

（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岁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

（周恩来：“六大”请他去。请他去，他不去，我给他谈的。他说你八七会议都丢了我了。）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形”是形式，右是本质。怎么办？你们去议吧，我没有睡觉。

（周恩来：除主席外，按笔画排……）共产党比别的党好一些，他不花钱买〔选〕票，谭言方两边都送票子，还是选省议员。一个省议员要花多少钱呀？我有一个亲戚四五个人花钱，买一个税务局长，时间三个月，所以赶快刮，把钱刮回来。有这么一个亲戚，也使我长见识。共产党不要买票，不要运动，不要抬棺游行（南京国大选举，抬棺游行）。目的在保证了领导，就是中央委员会，则有时选举，有时没有。过去经常有的，“六大”我当选了，我并没有到莫斯科去。共产党比较纯洁，政治纲领适合要求的，王明十年之后开除，不深入那时情况。后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嘛，不只是不买票嘛，党员嘛，总是要准备牺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

各根据地，无论是豫、鄂、皖，还是井冈山，活的不多了，抗日以来就多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如山西、贵州、山东要谈一谈。还要谈一谈，山东军队和省可以合并起来开一个会嘛，所以有的代表团冲一下，我也赞成。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至于黑龙江，工作不错嘛，比如贵州你自我批评也不干，批一下不可以？至于选举还是要选举，一个张日清，一个南萍。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博古）王明是反对的。

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画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

(1969年4月28日)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2]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

[1] 本篇和毛泽东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5月9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 恩来，即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资产阶级专政。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

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

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说，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1]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

[1] 指林彪1969年4月1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跟王效禹^[2]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

[1] 杨得志，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2]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1970年6月被免职。

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1]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2]，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儿，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3]。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

[1] 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 “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3]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

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1]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

[1] 皮定钧，当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1]、杨、余、傅^[2]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1] 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戚，指戚本禹，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7月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依法将他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2] 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在军队的职务。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指出这一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发言稿的批语^[1]

(1969年4月)

第二页说得太过分，宜删去。你可以另外写一些你自己的见解。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9年4月12日，他将自己准备在中共九大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前发言的稿子送毛泽东审阅。这个发言稿的第二页写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仅见的所向无敌的创造性人才。毛主席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思想、理论各方面战线上，在工、农、兵各方面战线上，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等等，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些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问题^[1]

(1969年4月)

—

一定要抓好典型。

—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讲的两条意见。1970年1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条意见。

关于清查“五·一六”^[1]问题的意见^[2]

(1969年5月、1970年2月)

—

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1]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2]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9年5月3日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1970年2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一段话，都引自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转发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曾对中央转发这个座谈会纪要批示：“同意。”

二

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

(1969年4月)

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1]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九大代表以及首都50万革命群众一起欢度劳动节。

[1] 这是毛泽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的一句话，同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这句话。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

对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 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69年5月)

照发。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9年5月7日为批转《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材料给毛泽东等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主席交办的这份材料，我们于5日晚宣读和讨论了一次，商定核实修改后由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并希望主要城市进行试点。中央批语稿及附件现送主席审批。中央批语稿指出，这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后面的“等地”两字改为“及其他大、中城市”。5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材料。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

清平乐·警觉苏修*

(1969年5月)

穷发之北，
海波泛荒垂。
熊黑向我蹲且嚎，
懦者肝胆破碎。

勇士团结一心，
暂缓同室搏命。
苏修贼心不死，
我辈岂是南明。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9年6月6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1969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这个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空军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230项，正在研究的80多项，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报告分5个方面介绍了具体情况，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反干扰性能强的机上雷达、地面雷达与通信保密技术的研制，通用化、小型化、机动化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利用废旧器材勤俭节约搞科研等。报告在开头和结尾两次把“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并用，一处说“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空前活跃”，另一处说“以革命带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工作”。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1]

(1969年6月26日)

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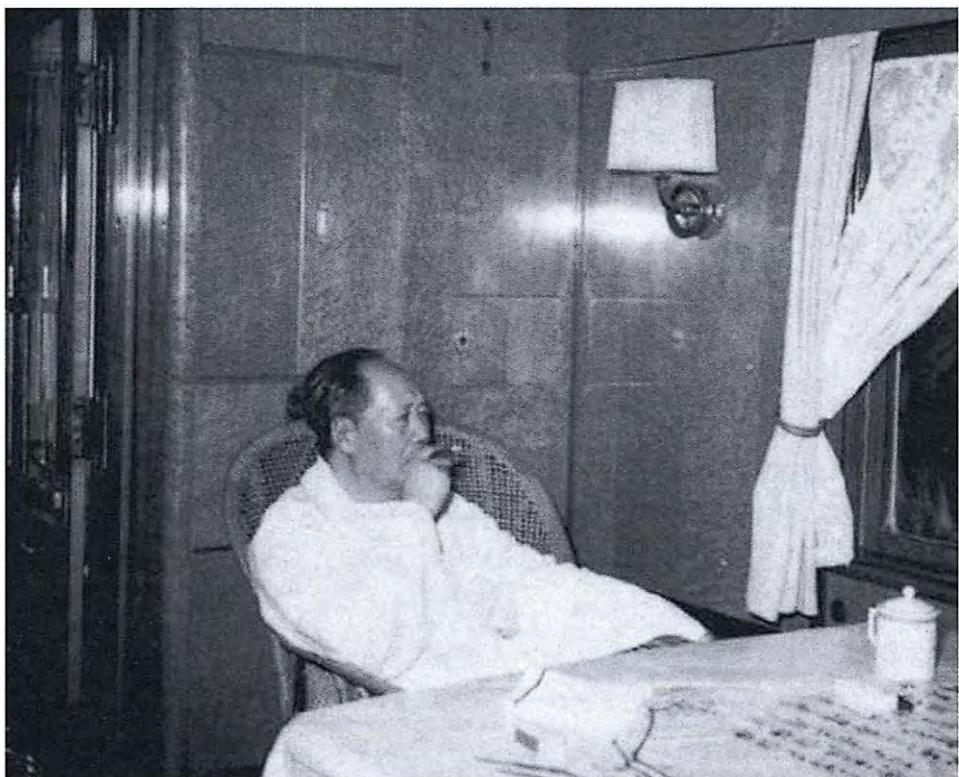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等谈话的一部分。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的批语

(1969年6月)

照办。

[1] 中共中央1969年6月12日发出的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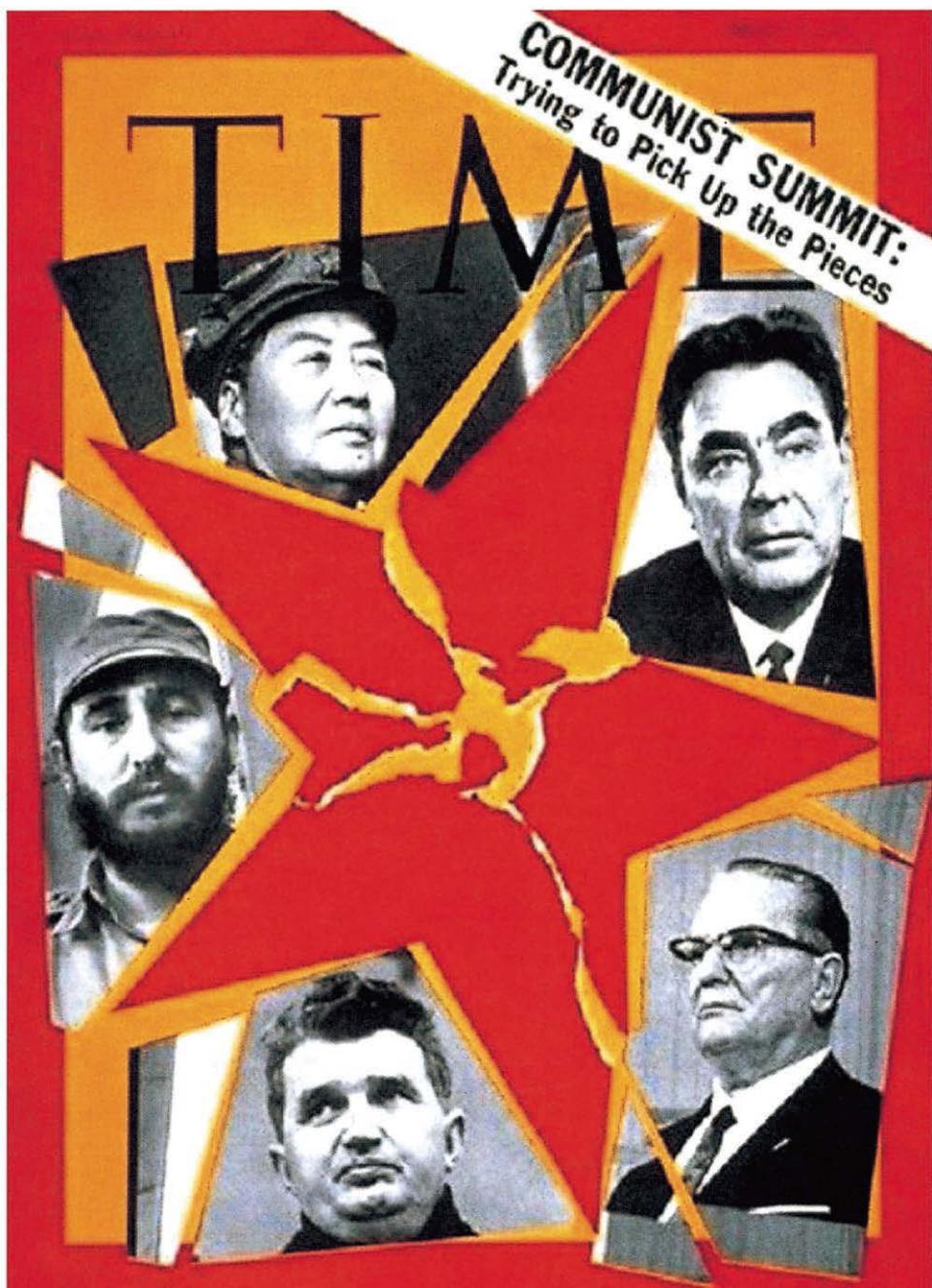
1969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



1969年6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和青年学生交谈。



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门前和工作人员的合影。



1969年6月13日，毛泽东和布里兹涅夫、铁托、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等一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对中央、国家机关 精简方案设想的批语^[1]

(1969年7月3日)

原则同意。

七月三日下午六时

[1] 周恩来1969年7月3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在主席临行前，曾报告过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取消和精简，准备成立各单位的革委会及其领导小组等问题，并连带提出了党中央各部委如何改革的问题。当时主席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对于党中央机关，拟保留中央文革（后未作为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办公室、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拟下放、合并或撤销。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9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遵照主席指示，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6个单位的军管负责人合并组成一个小组，由我派一人与之联系。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上。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 领导小组报告^[1]上的批语

(1969年7月21日)

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七月廿一日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根据当前解放军报社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们考虑，有必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对报社革命和生产实施一元化的领导。为此，解放军报社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十五名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关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为好。”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当时已下放到基层锻炼。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1]的批语

(1969年7月)

照办。

[1] 中共中央1969年7月23日的这个布告说，当前，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和晋中、晋南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

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 《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的批语^[1]

(1969年7月)

—

照发。

—

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9年7月23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而写的，原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这篇社论1969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 加强全军组织纪律性指示稿^[1]的批语

(1969年8月)

用军委名义发。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9年8月16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并写了这个批语。8月22日，中央军委发出这个指示。

对中共中央命令稿的批语^[1]

(1969年8月)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9年8月22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根据最近边疆各省、区和各地区发生的情况看来，需要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将对稳定局势有利。周恩来等送审的命令稿指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边疆军民，尤其担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这个命令。

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1]的批语

(1969年8月31日)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2]的批评也宜从缓。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1969年8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把《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因为现在才确知作者是写自己，真人真事。”“《林海雪原》的倾向主要方面也是不好的，主要表现在：不突出党的领导；不分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非正义性质；侦察工作神秘化；把杨子荣写得比土匪还土匪等等。”信中还提出把“杨子荣也改名为梁志彤”。

[2] 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9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四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几年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抗击着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前，尼克松^[1]政府正在加紧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企图用政治欺骗和所谓战争非美化的手法达到它永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远霸占越南南方的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赫鲁晓夫^[1]是这样，勃列日涅夫^[2]之流更是这样。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实现其同美帝国主义称霸和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野心，最近一个时期，更加紧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露骨地施展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妄图把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苏修叛徒集团做尽了坏事，他们同美帝是一丘之貉，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我们相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国土上全部赶出去。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越南人民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2]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天津。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和汪东兴、张玉凤等在天津。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和跟随南巡的警卫人员合影。

对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的 批语和修改^[1]

(1969年9月)

—

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

二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 周恩来等1969年9月8日送审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28条，毛泽东审阅时，在第21条后加写了一条（即本篇二），作为第22条，原来的第22条至第28条依次改为第23条至第29条。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工农兵观礼代表。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1]

(1969年10月14日)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1] 这是毛泽东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9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满怀胜利的豪情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经过长期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解放二十五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和捣乱，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江山。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阿尔巴尼亚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支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一座坚强堡垒。

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两党、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经历了暴风骤雨的考验。中阿友谊的不断发展，必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如何疯狂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让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1969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站在抗美鬥爭最前線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1]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2]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1] 约翰逊，1963年至1968年任美国总统。

[2]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9月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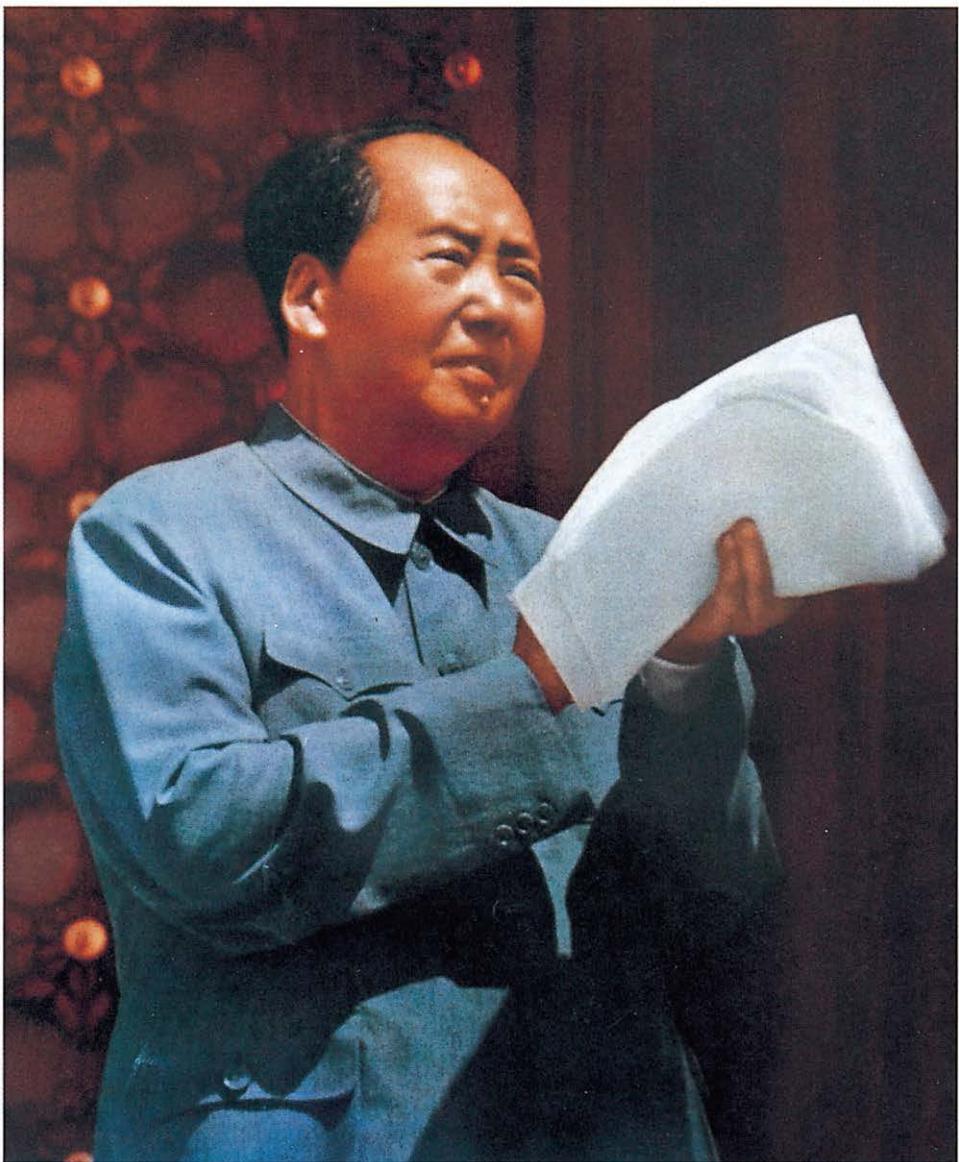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 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 检查报告的通知稿的批语^[1]

(1969年12月25日)

照办。

[1] 周恩来等1969年12月25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有关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分。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谣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上。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通知。

1970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学校 名誉校长的批语^[1]

(1970年1月)

江青^[2]不必任名誉校长。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信中说：“根据江青同志送来的两份信件，昨（廿一）日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商谈。江青同志并说明，现在筹办中的五·七艺术学校拟设在北京，以原劳动大学作校址，附近有农田四百多亩，可兼习农业劳动。同时，还拟在上海筹办一个上海五·七艺术学校。”“北京五·七艺术学校的组织机构，学科学制，招生计划和领导成员，拟同意两份报告中所提意见。妥否，请主席予以批示。”周恩来附送的五·七艺校临时筹委会1月21日报告中提议，江青为艺校荣誉校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为荣誉政委。

[2]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 报告上的批语^[1]

(1970年1月)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1月25日将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的一封来信转报毛泽东时写道，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4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指示稿的批语^[1]

(1970年1月)

照办。

[1] 周恩来等1970年1月30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念奴娇·长征*

(1970年1月)

万里气势，
不逶迤，
烽烟五津动摇。
雪山绝境，
荒草地，
四散溃逃几国焘。
娄山关后，
不为人知，
阴谋出年少。

回首如今多劳？
看我宝刀，
永无宁日好。
早年空空多浪费，
而今点石金。
老骥伏枥，
变本加厉，
做事要彻底。
江山已定，
谁人敢论功高？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 讲话大纲的批语^[1]

(1970年2月4日)

康生同志：

此件可以照你的意见办理。其中颂圣写成烦圣，请改正。

毛泽东

1970年2月4日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1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康生在报告中说：“去年编毛选五卷时，我记起在一九四一年政治局九月会议时主席曾写了一个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件事，各同志听说有这样一个大纲，一致要求印几份给政治局同志们看看。”“现在排了一份清样，送主席审阅，并请示是否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一阅，希望得到主席的批准。”1941年，毛泽东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倾向，曾写道：“不知迫蒋只知颂圣，提不出任务。”“不作阶级分析，全无列宁精神。”“群众原则，又妥协又斗争原则。”康生送审的讲话大纲上，将其中的“颂圣”印成“烦圣”，毛泽东审阅时作了改正。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 通知稿^[1]的批语

(1970年2月)

照办。

[1] 周恩来等1970年2月1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中央重申：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的非生产性建筑、生活设施必须从简；四、一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电影，不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此铺张浪费；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并附发了西安市、柳州市等几个地方铺张浪费、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的材料。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2月)

照办。

[1] 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2月5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中说，中央决定于2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通知稿中附有中央组织部业务组郭玉峰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



1970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0年3月13日)

同意。

三月十三日

[1] 周恩来等1970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昨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一、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国务院，党中央对该组的指示和决定，由国务院组织实施。三、文化组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若干人，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7人为组员。四、文化组设一小的工作机构。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 报告的批语^[1]

(1970年3月14日)

同意中央的部署。

三月十四日下午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3月1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等5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并作了修改，13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有些不便写入这一文件的，拟与各省来京同志面谈。周恩来送审的决定稿包括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四届人大代表的条件、名额、比例、选举方法等5个部分。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等5人组成，拟在3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待讨论、送审后再着手修改文字，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1]

(1970年3月)

照总理意见办。

[1]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0年3月8日将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时写道，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经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亦同意这个方案。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1]

(1970年3月)

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

附件留阅。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3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3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现呈上请主席审阅后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来京协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负责人名单。



1970年，毛泽东和护士长吴旭君在一起。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1]

(1970年3月)

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0年3月2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日、十二日或十三日，既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 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3月)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70年3月25日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有4条：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

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3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献给斯特朗^[1]的花圈上的挽词

(1970年4月2日)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1] 斯特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问中国。1946年第五次来中国时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毛泽东在接见她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58年她到中国定居，1970年去世。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70年4月3日)

—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2]，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泽东

1970年四月三日

因为删掉几段，注脚的号码请重新排一下。

二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3]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4]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三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1]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周恩来等1970年4月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修改稿上，原题为《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他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段话；本篇三是他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文字。这篇文章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在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5月1日

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

[2] 毛泽东在1970年4月1日送审稿第一、二页上，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在第二、三页上，删去了以下4段话：“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第五页上，删去了以下3段话：“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3]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1896年以后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1902年起多次任国会议员。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理论家。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从1910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1917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4]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1]

(1970年4月12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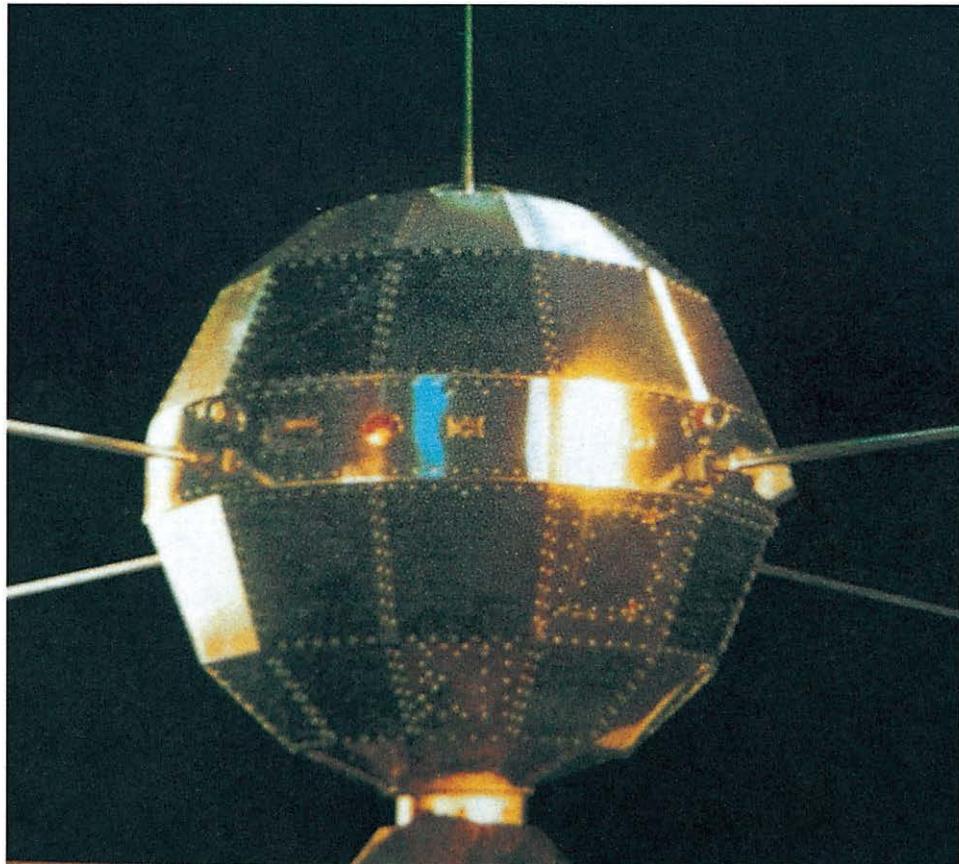
[1] 197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的这个材料时，曾批示：“照发。”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0年4月24日)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4月24日7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我国以三级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早在1968年年初得到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直到今春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3月底，运载火箭和卫星已运至基地，经检查测试，认为可行。4月中旬在京开会，经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目前，火箭和卫星已在发射阵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现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报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4月23日的请示发射报告。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共度节日。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外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和谢胡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